

大亞洲主義論集

目錄

大亞細亞主義	總理孫先生
中國與東亞	汪精衛
大亞洲主義的哲學基礎	周化人
大亞洲主義之史的發展	子遺
對於大亞洲主義的認識	胡蘭成
敬告懷疑大亞洲主義者	程獨清
大亞洲主義之精神	周匡
大亞洲主義與遠東門羅主義	子遺
述大亞洲主義	江鎮南
實現大亞洲主義的方法的意見	吳畏
大亞細亞主義之真義	胡漢民
編後	



大亞細亞主義

總理孫先生於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神戶對商業會議所等五團體演講

諸君。今天蒙諸君這樣熱誠的歡迎。我實在是非常的感激。今天大家定了一個問題。請我來講演。這個問題是大亞細亞主義。我們要講這個問題。便先要看清楚我們亞洲是一個什麼地方。我想我們亞洲就是最古文化的發祥地。在幾千年以前。我們亞洲人便已經得到了很高的文化。就是歐洲最古的國家。像希臘羅馬那些古國的文化。都是從亞洲傳過去的。我們亞洲從前有哲學的文化。宗教的文化。倫理的文化。和工業的文化。這些文化都是亘古以來。在世界上很有名的。推到近代世界上最新的種種文化。都是由於我們這種老文化發生出來的。到近幾百年以來。我們亞洲各民族才漸漸萎靡。亞洲各國家才漸漸衰弱。歐洲各民族才漸漸發揚。歐洲各國家才漸漸強盛起來。到了歐洲的各民族發揚。和各國家強盛之後。他們的勢力更漸漸侵入東洋。把我們亞洲的各民族和國家。不是一個一個的銷滅。便是一個一個的壓制起來。一直到三十年以前。我們亞洲全部。可以說沒有一個完全獨立的國家。到那個時候。可以說是世界的潮流。走到了極端。但是否極泰來。物極必反。亞洲衰弱。走到了這個極端。便另外發生一個轉

機。那個轉機就是亞洲復興的起點。亞洲衰弱。到了三十年以前。又再復興。那個要點是在什麼地方呢。就是在日本當三十年以前。廢除了和外國所立的一些不平等條約。日本廢除不平等條約的那一天。就是我們全亞洲民族復興的一天。日本自從廢除了不平等條約之後。便成了亞洲的頭一個獨立國家。其他亞洲的有名國家。像中國印度波斯阿富汗阿拉伯土耳其。都不是獨立的國家。都是由歐洲任意宰割。做歐洲的殖民地。在三十年以前。日本也是歐洲的一個殖民地。但是日本的國民有先見之明。知道民族和國家之何以強盛與衰弱的關鍵。便發奮爲雄。同歐洲人奮鬥。廢除所有不平等的條約。把日本變成一個獨立國家。自日本在東亞獨立了之後。於是亞洲全部各國家和各民族。便另外生出一個大希望。以爲日本可以廢除條約來獨立。他們也當然可以照樣。便從此發生胆量。做種種獨立運動。要脫離歐洲人的束縛。不做歐洲的殖民地。要做亞洲的主人翁。這種思想。是近三十年以來的思想。是很樂觀的思想。

說到三十年以前。我們亞洲全部的民族思想便大不相同。以爲歐洲的文化是那樣進步。科學是那樣進步。工業上的製造也是那樣進步。武器又精良。兵力又雄厚。我們亞洲別無他長。以爲亞洲一定不能抵抗歐洲。一定不能脫離歐洲的壓迫。要永遠做歐洲的奴隸。這種思想。是三十年以前的思想。是很悲觀的思想。

就是從日本廢除了不平等條約之後。在日本雖然成了一個獨立國家。和日本很接近的民族和國家。雖然要受大影響。但是那種影響還不能一時傳達到全亞洲。亞洲全部的民族。還沒有受大震動。再經過十年之後。便發生日俄之戰。日本便戰勝俄國。日本人戰勝俄國人。是亞洲民族在最近幾百年中頭一次戰勝歐洲人。這次戰爭的影響。便馬上傳達到全亞洲。亞洲全部的民族便驚天喜地。發生一個極大的希望。這是我親眼所見的事。現在可以和諸君略為談談。當日俄戰爭開始的那一年。我正在歐洲。有一日聽到東鄉大將打敗俄國的海軍。把俄國新由歐洲調到海參衛的艦隊。在日本海打到全軍覆沒。這個消息傳到歐洲。歐洲全部人民為之悲憂。如喪考妣。英國雖然是和日本同盟。而英國人士一聽到了這個消息。大多數也都是搖首纒眉。以為日本得了這個大勝利。終非白人之福。這正是英國話所說 *Blood is Thicker than Water* 的觀念。不久我由歐洲坐船回亞洲。經過蘇彝士運河的時候。便有許多土人來見我。那些土人大概是阿拉伯人。他們看見我是黃色人。便現出很歡喜的急忙的樣子來問我說。你是不是日本人呀。我答應說。不是的。我是中國人。你們有什麼事情呢。你們為什麼現出這樣的高興呢。他們答應說。我們新得了一個極好的消息。聽到說日本銷滅了俄國新由歐洲調去的海軍。不知道這個消息是不是的確呢。而且我們住在運河的兩邊。總是看見俄國的

傷兵。由一船一船的運回歐洲去。這一定是俄國打了大敗仗的景況。從前我們東方有色的民族。總是被西方民族的壓迫。總是受痛苦。以爲沒有出頭的日子。這次日本打敗俄國。我們當作是東方民族打敗西方民族。日本人打勝仗。我們當作是自己打勝仗一樣。這是一種應該歡天喜地的事。所以我們便這樣高興。便這樣喜歡。像這個樣子看起來。日本戰勝俄國。是不是影響到亞洲全部的民族呢。那個影響是不是很大呢。至於那次日本戰勝俄國的消息。在東方的亞洲人聽了。或者以爲不大重要。不極高興。但是在西方的亞洲人。和歐洲人毗連。朝夕相見。天天受他們的壓迫。天天覺得痛苦。他們所受的壓迫。比較東方人更大。所受的痛苦。比東方人更深。所以他們聽到了那次戰勝的消息。所現出的高興。更比較我們東方人尤甚。

從日本戰勝俄國之日起。亞洲全部民族便想打破歐洲。便發生獨立的運動。所以埃及有獨立的運動。波斯土耳其有獨立的運動。阿富汗阿拉伯有獨立的運動。印度人也從此生出獨立的運動。所以日本戰勝俄國的結果。便生出亞洲民族獨立的大希望，這種希望從發生之日起。一直到今日不過二十年。埃及的獨立便成了事實。土耳其的完全獨立也成了事實。波斯阿富汗。和阿拉伯的獨立。也成了事實。就是最近印度的獨立運動。也是天天發達。這種獨立的事實。便是亞洲

民族思想在最近進步的表示。這種進步的思想發達。到了極點。然後亞洲全部的民族才可聯絡起來。然後亞洲全部民族的獨立運動。才可以成功。近來在亞洲西部的各民族。彼此都有很親密的交際。很誠懇的感情。他們都可以聯絡起來。在亞洲東部最大的民族。是中國與日本。中國同日本。就是這種運動的原動力。這種原動力發生了結果之後。我們中國人此刻不知道。你們日本人此刻也是不知道。所以中國同日本。現在還沒有大聯絡。將來潮流所趨。我們在亞洲東方的各民族。也是一定要聯絡的。東西兩方民族之所以發生這種潮流。和要實現這種事實的原故。就是要恢復我們亞洲從前的地位。

這種潮流在歐美人看得是很清楚的。所以美國便有一位學者。曾做一本書。專討論有色人種的興起。這本書的內容是說日本打敗俄國。就是黃人打敗白人。將來這種潮流擴張之後。有色人種都可以聯絡起來和白人爲難。這便是白人的禍害。白人應該要思患預防。他後來更做了一本書。指斥一切民族解放之事業的運動。都是反叛文化的運動。照他的主張。在歐洲的民族解放運動。固然是當作文化化的反叛。至於亞洲的民族解放運動。更是應該當作反叛事業。這種思想在歐美一切特殊階級的人士。都是相同的。所以他們用少數人既是壓制了本洲和本國的大多數人。更把那種流毒推廣到亞洲。來壓制我們九萬萬民族。要我們九萬萬的大

多數做他們少數人的奴隸。這真是非常的慘酷。真是可惡已極。而這位美國學者的論調。還以為亞洲民族有了感覺。便是對於世界文化的反叛。由此便可見歐洲人自視為傳授文化的正統。自以文化的主人翁自居。在歐洲人以外的。有了文化發生。有了獨立的思想。便視為反叛。所以用歐洲的文化和東洋的文化相比較。他們自然是以歐洲的文化。是合乎正義人道的文化。以亞洲的文化。是不合乎正義人道的文化。

專就最近幾百年的文化講。歐洲的物質文化極發達。我們東洋的這種文明不進步。從表面的觀瞻比較起來。歐洲自然好於亞洲。但是從根本上解剖起來。歐洲近百年是什麼文化呢。是科學的文化。是注重功利的文化。這種文化應用到人類社會。只見物質文明。只見飛機炸彈。只有洋槍大炮。專是一種武力的文化。歐洲人近來專用這種武力的文化。壓迫我們亞洲。所以我們亞洲便不能進步。這種專用武力壓迫人的文化。用我們中國的古話說就是行霸道。所以歐洲的文化是霸道的文化。但是我們東洋向來輕視霸道的文化。還有一種文化。好過霸道的文化。這種文化的本質。是仁義道德。用這種仁義道德的文化。是感化人。不是壓迫人。是要人懷德。不是要人畏威。這種要人懷德的文化。我們中國的古話就說是行王道。所以亞洲的文化。就是王道的文化。自歐洲的物質文明發達。霸道大

行之後。世界各國的道德。便天天退步。就是亞洲。也有幾個國家的道德。也是很退步。近來歐美學者稍爲留心東洋文化。也漸漸知道東洋的物質文明。雖然不如西方。但是東洋的道德。便比西方高得多。

用霸道的文化和王道的文化比較起來說。究竟是那一種有益於正義和人道。那一種是有利於民族和國家。諸君可以自己證明。我也可以舉一個例子來說明。譬如從五百年以前以至兩千年以前。當中有一千多年。中國在世界上是頂強的國家。國家的地位。好像現在的英國美國一樣。英國美國現在的強盛。還是列強。中國從前的強盛。是獨強。中國當獨強的時候。對於各弱小民族和各弱小國家是怎麼樣呢。當時各弱小民族和各弱小國家。對於中國又是怎麼樣呢。當時各弱小民族和國家。都是拜中國爲上邦。要到中國來朝貢。要中國收他們爲藩屬。以能夠到中國來朝貢的爲榮耀。不能到中國來朝貢的是恥辱。當時來朝貢中國的。不是亞洲各國。就是歐洲西方各國。也有不怕路遠而來的。中國從前能夠要那樣多的國家和那樣遠的民族來朝貢。是用什麼方法呢。是不是用海陸軍的霸道。強迫他們來朝貢呢。不是的。中國完全是用王道感化他們。他們是懷中國的德。甘心情願。自己來朝貢的。他們一受了中國王道的感化。不只是到中國來朝貢一次。並且子子孫孫都要到中國來朝貢。這種事實。到最近還有證據。譬如在印度

的北方。有兩個小國。一個叫做布丹。一個叫做尼泊爾。那兩個國家雖然是小。但是民族很強盛。又很強悍。勇敢善戰。尼泊爾的民族。叫做廓爾喀。尤其是勇敢善戰。現在英國治印度。常常到尼泊爾去招廓爾喀人當兵來壓服印度。英國能夠滅很大的印度。把印度做殖民地。但是不敢輕視尼泊爾。每年還要津貼尼泊爾許多錢。才能派一個考查政治的駐紮官。像英國是現在世界上頂強的國家。尙且是這樣恭敬尼泊爾。可見尼泊爾是亞洲的一個強國。尼泊爾這個強國對於英國是怎樣呢。英國強了一百多年。英國滅印度也要到一百多年。尼泊爾和英國的殖民地。密邇連接有這樣的久。不但是不到英國去進貢。反要受英國的津貼。至於尼泊爾於中國是怎樣呢。中國的國家地位現在一落千丈。還趕不上英國一個殖民地。離尼泊爾又極遠。當中還要隔一個很大的西藏。尼泊爾至今還是拜中國爲上邦。在民國元年還走西藏到中國來進貢。後來走到四川邊境。因爲交通不方便。所以沒有再來。就尼泊爾對於中國和英國的區別。諸君看是奇怪不奇怪呢。專拿尼泊爾民族對於中國和英國的態度說。便可以比較中國的東方文明和英國的西方文明。中國國勢雖然衰了幾百年。但是文化尙存。尼泊爾還要視爲上邦。英國現在雖然是很強盛。有很好的物質的文明。但是尼泊爾不理會。由此便可知尼泊爾是受了中國的感化。尼泊爾視中國的文化。才是真文化。視英國的物質文明。不

當作文化。只當作霸道。

我們現在講大亞洲主義。研究到這個地步。究竟是什麼問題呢。簡而言之。就是文化問題。就是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比較和衝突問題。東方的文化是王道。西方的文化是霸道。講王道是主張仁義道德。講霸道是主張功利強權。講仁義道德。是由正義公理來感化人。講功利強權。是用洋槍大砲來壓迫人。受了感化的人。就是上國衰了幾百年。還是不能忘記。還像尼泊爾至今是甘心情願。要拜中國爲上邦。受了壓迫的人。就是上國當時很強盛。還是時時想脫離。像英國征服了埃及。滅了印度。就是英國極強盛。埃及印度還是時時刻刻要脫離英國。時時刻刻做獨立的運動。不過處於英國大武力壓制之下。所以一時不能成功。假若英國一時衰弱了。埃及印度不要等到五年。他們馬上就要推翻英國政府。來恢復自己的獨立地位。諸君聽到這裏。當然可知道東西文化的優劣。我們現在處於這個新世界。要造成我們的大亞洲主義。應該用什麼做基礎呢。就應該用我們固有的文化做基礎。要講道德。說仁義。仁義道德就是我們大亞洲主義的好基礎。我們有了這種好基礎。另外還要學歐洲的科學。振興工業。改良武器。不過我們振興工業。改良武器。來學歐洲。並不是學歐洲來銷滅別的國家。壓迫別的民族的。我們學來自衛的。

近來亞洲國家學歐洲武功文化。以日本算最完全。日本的海軍製造。海軍駕駛。不必靠歐洲人。日本的陸軍製造。陸軍運用。也可以自己作主。所以日本是亞洲東方一個完全的獨立國家。我們亞洲還有個國家。當歐戰的時候。曾加入同盟國的一方面。一敗塗地。已經被人瓜分了。在歐戰之後。又把歐洲人趕走了。現在也成了一個完全獨立的國家。這個國家就是土耳其。現在亞洲只有兩個頂大的獨立國家。東邊是日本。西邊是土耳其。日本和土耳其。就是亞洲東西兩個屏障。現在波斯阿富汗阿拉伯也起來學歐洲。也經營了很好的武備。歐洲人也是不敢輕視那些民族的。至於尼泊爾的民族。英國人尚且不敢輕視。自然也有很好的武備。中國現在有很多的武備。一統一之後。便極有勢力。我們要講大亞洲主義。恢復亞洲民族的地位。只用仁義道德做基礎。聯合各部的民族。亞洲全部民族便很有勢力。

不過對於歐洲人。只用仁義去感化他們。要請在亞洲的歐洲人。都是和平的退回我們的權利。那就像與虎謀皮。一定是做不到的。我們完全收回我們的權利。便要訴諸武力。再說到武力。日本老早有了很完備的武力。土耳其最近也有了很完備的武力。其他波斯阿富汗阿拉伯廓爾喀各民族都是向來善戰的。我們中國人數有四萬萬。雖然愛和平。但是爲生死的關頭。也當然是要奮鬥的。當然有

很大的武力。如果亞洲民族全部聯合起來。用這樣固有的武力。去和歐洲人講武。一定是有勝無敗的。更就歐洲和亞洲的人數來比較。中國有四萬萬人。印度有三萬萬五千萬。緬甸安南木蘭由共起來有幾千萬。日本一國有幾千萬。其他各弱小民族有幾千萬。我們亞洲人數占全世界的人數要過四分之一。歐洲人數不過四萬萬。我們亞洲全部的人數有九萬萬。用四萬萬人的少數來壓迫九萬萬人的多數。這是和正義人道大不相同的。反乎正義人道的行爲。終久是要失敗的。而且在他們四萬萬人之中。近來也有被我們感化了。所以現在世界文化的潮流。就是在英國美國。有少數人提倡仁義道德。至於在其他各野蠻之邦。也是有這種提倡。由此可見西方之功利強權的文化。便要服從東方之仁義道德的文化。這便是霸道要服從王道。這便是世界的文化。日趨於光明。

現在歐洲有一個新國家。這個國家是歐洲全部白人所排斥的。歐洲人都視他爲毒蛇猛獸。不是人類。不敢和他相接近。我們亞洲也有許多人都是這樣的眼光。這個國家是誰呢。就是俄國。俄國現在要和歐洲的白人分家。他爲什麼要這樣做呢。就是因爲他主張王道。不主張霸道。他要講仁義道德。不願講功利強權。他極力主持公道。不贊成用少數壓迫多數。像這個情形。俄國最近的新文化便極合我們東方的舊文化。所以他便要來和東方攜手。要和西方分家。歐洲人因

爲俄國的新主張。不和他們同調。恐怕他的這種主張成功。打破了他們的霸道。故不說俄國是仁義正道。反誣他是世界的反叛。

我們講大亞洲主義。研究到結果。究竟要解決什麼問題呢。就是爲亞洲受苦的民族。要怎樣方可以抵抗各洲強盛民族的問題。簡而言之。就是要爲被壓迫的民族來打不平的問題。受壓迫的民族。不但是在亞洲專有的。就是在歐洲境內。也是有的。行霸道的國家。不只是壓迫外洲同外國的民族。就是在本洲本國之內。也是一樣壓迫的。我們講大亞洲主義。以王道爲基礎。是爲打不平。美國學者對於一切民衆解放的運動。視爲文化的反叛。所以我們現在所提出來打不平的文化。是反叛霸道的文化。是求一切民衆和平等解放的文化。你們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歐美的霸道的文化。又有亞洲王道文化的本質。從今以後對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鷹犬。或是做東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們日本國民去詳審慎擇。

中國與東亞

汪精衛

汪先生應日本『中央公論』雜誌之請。特別寄稿。登於十月份秋季特大號。茲從日本文譯出。轉載於此。

編者謹識。

在中日戰爭繼續進行中。日本輿論界喊出『東亞協同體』的口號。去歲十二月廿二日日本政府的聲明。也宣稱企圖『建設東亞新秩序』。所謂東亞協同體與東亞新秩序。其定義與內容還沒有十分明顯。還沒有十分充實。但我們從其論據中。可以得到二個要點。一爲排斥侵略主義。二爲排斥共產主義。侵略主義來自西洋。以經濟侵略爲骨幹。以軍事侵略助成之。自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受着不平等條約的束縛。陷入次殖民地地位。至今百年了。共產主義亦來自西洋。輸入中國尙未滿二十年。然其階級鬥爭之說。使中國人互相殘殺。盡歸於死亡。拿譬喻來說。侵略主義如同痼疾。使中國奄奄不振。終至於死亡。共產主義則如急病。使中國迅即毀滅。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用其國力抵制侵略主義。使其不能在國內橫行了。共產主義雖曾企圖侵入日本。然日本社會組織已臻健全。故無隙可入。唯中國如果受了侵略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禍害。那末便是東亞的一部受了它的禍害。而東亞全部亦必勢將不免。結局日本也不能逃出圈外。所謂

『東亞協同體』與『建設東亞新秩序』。實即着眼於此。圖以自由獨立的精神。排斥侵略主義與共產主義。使其不能貽禍東亞。

但是中國的輿論界。對於『東亞協同體』與『建設東亞新秩序』這二個題目。不但不感興趣。反而懷抱疑慮。甚至有加以詛咒者。其原因何在呢。這點我希望中國人深自反省。同時也希望日本的輿論界加以注意。中國人現在所最憂慮者。厥爲日本是否要滅亡中國。有些人說。侵略主義與共產主義固然可怖。然日本如果滅亡中國。則更屬可怖。故中國與侵略主義共產主義的國家相聯合。以反抗日本。此事雖明知爲飲鴆止渴。然較不抗而亡爲善。爲什麼有這種論調呢。因爲日本之排斥共產主義。中國人是知道的。然日本之排斥侵略主義。中國人却未曾知道。中國人以爲日本也是一個侵略主義者。特別是她對中國侵略最易而且最甚。不僅是『以暴易暴』。而且爲暴中之暴。因爲中國人有這種誤解。所以把『東亞協同體』和『建設東亞新秩序』。視爲滅亡中國的代名詞。因而起了疑慮和詛咒的念頭。

日本的輿論界聽到了我這種話。一定會感覺驚駭。以爲中國人不注意日本輿論的趨向吧。自中日戰爭勃發以來。日本國民深憂東亞的前途。知道中日兩國長此交戰。結果徒增侵略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氣焰。而陷東亞於水深火熱之中。所以

毅然定計。提倡『東亞協同體』與『建設東亞新秩序』。希望中國人澈底了解。互相協力。一致進行。以改造東亞的天地。但是中國人對於這種趨向却不諒解。反而發生了上述的誤會。這點日本的輿論界如果要指責。我是願意接受的。但是我也要向日本的輿論界進一言。古人說過。『易地則皆然』。日本現為強國。日本人現為強國之民。故希望改造東亞。這是當然的事。但是在中國人呢。他們對於自己國家的滅亡。憂之不暇。安有餘力更來憂東亞呢。昔晉惠帝問其臣曰。『何謂荒年。』其臣對曰。『無穀食也。』帝曰。『何不食肉糜。』現在中國憂慮其國家的滅亡。正如憂慮無穀可食。而與其談改造東亞。即無異與其談食肉糜。此點希望日本的輿論界一加考慮。

日本為東亞的先進國。故關於改造東亞。日本有指導的權利與義務。這是中國人所能首肯的。中國在東亞是地廣人眾。且有悠遠歷史的國家。所以關於改造東亞。中國也有分擔責任的義務。這也是中國人所知道的。中國之所憂者。厥為如何始能有分擔此責任的能力。換一句話說。倘中國亡了。當然根本談不到分擔責任。如不亡而主權受了限制。獨立自由不能完備。那末分擔責任的能力亦必薄弱。所以中國之求生存。求獨立自由。不但為中國着想。同時亦即為東亞着想。關於此點。切望日本的輿論界深切了解。而中國的輿論界也不可加以注意。中

國之生存與獨立自由。必在侵略主義與共產主義絕跡之後方能完全達到。中國要達到此目的。當然須與日本協力。同時亦應尊重各國在華所有合法的權利。維持各國的友誼。但是對於侵略主義與共產主義。決不容其存在。尤不應有加以利用的意圖。必如此。方能如意獲得分擔責任之實。要之。日本如期望中國分擔責任。則不可遺忘了中國獨立自由之不可侵犯。中國如期待日本不妨礙其獨立自由。則不可忽視了共同的目的。如是。各自努力。互相了解。改造東亞之大業。始能邁進。以至於成功。

中國國民黨總理 孫先生之大亞洲主義。及最近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都明確指示出中國與東亞的關係。及中國應該努力的地方。我們以此自勉。以此互勉。並以此獻給日本的輿論界。

大亞洲主義的哲學基礎

周化人

大亞洲主義是 總理孫先生最後的一次講演，也就是他畢生奮鬥的目的及祈求其實現的理想，無疑的這是孫先生最後的政治主張，和遺給我們最寶貴的遺產了。我們研究 總理遺教，亦當以此爲最終論定的。這一個政治主張，不特爲東亞中日兩國人士所歡迎，而且爲亞洲的民族所歡迎，這是孫先生思想的偉大，這種偉大的思想，是導源於中國古代哲學的。如「博愛」，「和平」，「仁義」，「道德」等，都是中國歷代傳統的國粹，而爲孫先生平日所服膺的。「博愛」二字是孫先生平日喜歡書以贈同志的，博愛的精神，就是墨子「兼愛」的精神，墨子說：「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當察亂何自起？起不相愛。……盜愛其寶，不愛其異寶，故竊異寶以利其寶。賊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大夫各愛其家，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其家。諸候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其國。……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愛，若使天下……視人之寶若其寶，誰竊？視人身若其身，誰賊？視人家若其家，誰亂？視人之國若其國，誰攻？……故天下兼相愛則治，交相惡則亂。」這是墨子的兼愛哲學，孫先生平日所主張的博愛，是與此說相同的。因爲孫先生愛中國，所以他數

十年如一日的獻身革命，以挽救中國的危亡。同時，他亦愛亞洲被壓迫的民族，所以主張聯合起來，以解除其束縛，使亞洲的有色人種，俱獲得自由。這種「已飢已溺」的博愛精神，是中國寶貴的傳統。孫先生繼承這種傳統，闡發而為大亞洲主義，這是很顯明的。

「和平」是孫先生的最後遺言，也是中國古代哲學一個重要的傳述。例如老子的人生哲學即有下列的記載：「江海所以能為百川王者，以善下之，故能為百川王。……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與之爭。」「上善若水，水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勝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這便是老子濡弱謙下的「和平主義」。他深知武力的競爭，以暴禦暴，只有更烈，決沒有止境，只有消極的軟工夫，可以抵抗殘暴，狂風吹不斷柳絲，齒落而舌長存，又如最柔弱的水可以衝開山石，鑿成江河。人類交際，也是如此。這種不爭的和平美德，經過數千年的淘融，遂成爲日常生活的一種軌範，而形成爲今日國民的意識形態。所以孫先生在民族主義第六講說：「中國有一種極好的道德，是愛好和平。現在世界上的國家和民族，只有中國是講和平，外國都是講戰爭，主張帝國主義去滅人的國家。近年因

爲經過許多大戰，殘殺太大，才主張免去戰爭，開了好幾次和平會議，像從前的海牙會議，歐戰之後的華賽爾會議，金那瓦會議，華盛頓會議，最近的洛桑會議。但是這些會議，各國公同去講和平，是因爲怕戰爭，出於勉強而然的，不是出於一般國民的天性。中國人幾千年酷愛和平都是出於天性。論到個人便重謙讓，論到政治便說「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和外國人便有大大的不同，所以中國從前的忠孝仁愛信義種種的舊道德，固然是駕乎外國人，說到和平的道德，更是駕乎外國人。這種特別的好道德，便是我們民族的精神，我們以後對於這種精神，不但是要保存，並且要發揚光大，然後我們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復。「孫先生的和平思想是脫胎於古代哲學及民族的和平精神的。他激賞和平爲民族的原動力，欲以和平精神來恢復中華民族的固有地位，更欲以和平精神來恢復亞洲民族的固有地位。所以和平爲大亞洲主義的要素。

說到「仁義」二字，則爲中國特有的政治哲學。翻開一部二十四史，凡是施行仁政的，其國必治，反之則亂。這可說是已經形成的鐵則，故中國歷代先哲對於仁義之提倡，不遺餘力。其最著者則爲孟子：「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

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違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又告子篇下「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不丘，曰先生將何之？曰吾聞秦楚搆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孟子這樣子提倡仁義爲政治教化之本，不特後世奉爲準則，而且成爲習俗，「居仁由義」據德依仁」的教條，普遍於民間，這種文化，是我國特有的精神，所以孫先生說：「這種文化的本質是仁義道德，用這種仁義道德的文化，是感化人，不是壓迫人。是要人懷德，不是要人畏威。這

種要人懷德的文化，我們中國的古話就說是行王道。所以亞洲的文化，就是王道的文化。」由此可知孫先生所說的大亞洲主義，就是這種王道的精神。大亞洲主義的精神，和歷代先哲所說的仁義之說是一貫的。

「道德」是中國素來尊崇的。論語：「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孔子又說：「大道者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非德道不尊，非道德不明，雖有國之良臣，不以其道服治之，不可以取道里。雖有博地衆民，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致霸王。是故昔者明王，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然後可以守，三至行，然後可以征。明王之道，其守也，則必折衝千里之外，其征也，則必還師衽席之上。故曰內修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王之道。」這是孔子的政治哲學。孔子是主張以德治天下的，所以他說：「上敬老，則下益孝，上尊齒，則下益弟。上樂施，則下益寬。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恥事。上廉讓，則下恥節。此之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政教定，則本正矣。凡上者，民之表，表正則何物不正！是故人君先立仁於己，然後大夫忠而士信，民敦俗樸，男懿而女貞，六者教之致也。布諸天下四方而不窳，納諸尋常之室而不寒，等之以禮，立之以義，行之以順，則民之忌惡，如湯之灌雪焉。」這是他主張德治的具體辦法。中國歷代的帝王，常有

遵守這種教條而獲得郅治的。並且經過先哲的闡發提倡，把道德觀念變成爲社會上不成文的法律。於是道德成爲個人立身處世的準則，國家行政的根據，其裁制力是超乎有形的法律，無形的神權以上的。道德既爲個人的最高理想，政治的無上極則，怎樣可以養成這種行德呢？大學上說：「古之欲明修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這一段修業進德的方法是很完備的。他把「修身」作爲一切的根本，格物，致知，正心，誠意，都是修身的工夫。齊家，治國，平天下，都是修身的效果。這樣便把個人的道德和政治的行爲聯繫起來，所以孫先生說：「中國古時有很好的政治哲學，我們以爲歐美的國家，近來很進步，但是說到他們的新文化，還不如我們政治哲學的完全。中國有一段最有系統的政治哲學，就是大學中所說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那一段的話。把一個人從內發揚到外，由一個人的內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這樣精微開展的理論，無論外國甚麼政治哲學家都沒有見到，都沒有說出。這就是我們政治哲學的智識中獨有的寶貝，是應該要保存的。這種正心誠意修身齊家的道理，是屬於道

德範圍的。」孫先生推崇這種理論，以道德為政治哲學的基礎的理論，無疑的，他是繼承這種學說，主張以道德來治國平天下，達到世界大同的目的。自然他所提倡的大亞洲主義，也是以道德為基礎的。所以他說：「要建設大亞細亞主義，究竟應該以甚麼為基礎呢？我們應當以我們固有的文化為基礎，即講究仁義道德，仁義道德即大亞細亞的最好基礎。」由此可徵大亞洲主義，是仁義道德的結晶，和我們的古代政治哲學，是一脈相承的。

以上徵引古代博愛和平仁義道德的學說，都是孫先生講述三民主義及大亞洲主義時常提到的論證。由於這種仁義道德博愛和平學說的傳播，遂交織成爲東方文化的特徵。這種特徵，就是「王道」的精神，我們東亞的民族孕育於這種王道的文化生活中，已經數千年了。「例如自五百年前至二千年前，其間相隔有一千餘年，中國是世界的強國，就國家的地位，猶如今日的英美，英美現在雖然強盛，但亦不過列強而已。當時中國的強却是獨強，中國在這種獨強的時代，對於其他弱小國家與民族是怎樣的呢？當時各弱小民族與國家，均奉中國爲上國，以來中國朝貢爲榮，而認爲不能來中國朝貢爲恥，當時到中國來朝貢的，不單是亞洲各國，就是歐洲西方各國亦轉地自遠方趕來。可是當時中國究竟用甚麼方法使許多國家和遠方民族肯來進貢呢？用海陸軍行霸道強迫他們來朝貢嗎？不是的，

中國乃完全以王道感化他們，他們對中國懷德之餘，都自願前來進貢。他們一度受王道的感化，不僅前來朝貢一次，而是子子孫孫都來朝貢的。」（大亞細亞主義）我們的祖先對於王道的精神，可謂發揮盡致，實行盡力了，中國以前雖處極強盛的時代，亦不以其武力加諸弱小民族的身上，從沒有採用帝國主義的手段，來滅亡其他弱小的國家。這種光榮的歷史傳統，是孫先生贊賞不置的。繼承這種歷史的傳統，發揮東方的王道精神，貫徹這種王道精神而求其實現的，則爲他所說的大亞細亞主義。

孫先生講述「大亞細亞主義」時爲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當時的國際形勢怎麼樣？那正是第一次歐戰結束不久，資本主義列強瘡痍滿地，正在設法補償及謀恢復的時候。自然列強的眼光會注視到亞洲這一塊大地上來。那時亞洲的獨立國家，東亞只有一個日本，西亞只有一個土耳其，中國則在列強資本主義侵略之下，日在紛亂掙扎之中，怎不令孫先生爲亞洲焦急，爲中國焦急！孫先生爲謀中國的獨立自由平等，所以提倡三民主義。爲謀亞洲的獨立自由平等，所以提倡大亞細亞主義，三民主義的目的是救中國，大亞洲主義的目的是救亞洲，這兩個主義的精神是一致的。因爲西方的功利主義，自十九世紀產業革命以來，日逐膨脹，帝國主義的侵略，隨着軍事政治的力量而俱來，東方落後的民族，遂逐漸

變爲帝國主義的殖民地。亞洲雖大，已無一片乾淨之土，在經濟政治侵略下的亞洲，可以說有色人種，已變爲白種人的奴隸，在帝國主義者的心目中「近東」與「遠東」，亦不過非洲第二耳，在其砲艦政策控制之下，黃種不難俯首帖耳地屈服的。不料日本維新，發憤自強，日俄戰爭，竟把俄國打得一敗塗地。這是出乎白種人意料之外的。所以孫先生說：「日俄戰爭，結果是日本打勝了俄國，這是近幾百年來亞洲民族第一次戰勝歐洲人，全亞洲的民族更蓬勃地產生了一大希望。這是我親眼看見的事實，所以才敢告訴諸君。日俄戰爭開始的一年，我正在歐洲。某日聽見東鄉大將擊破俄國海軍，俄國新成立的海參威艦隊，自歐洲開往日本海的途中，全艦隊悉告覆滅。這消息傳到歐洲時，全歐人民竟悲痛得如喪考妣。那時英國雖和日本同盟，但聞訊之後，也感覺到異常不安。因爲他們認爲日本人得此大勝仗，結局終非白人之福，這正是英國話所說：「Blood is thicker than water」血比水濃的觀念。嗣後不久，我自歐洲趁船歸亞洲。通過蘇彝士運河的時候，來了許多土人，多數是阿刺伯人，他們一看見我是黃種人，均現歡喜之色，「你是日本人嗎？」他們匆匆地問我。「不是的，我是中國人，諸位這樣高興，有何貴幹？」經我那麼一問，才知道他們已聽到了非常愉快的消息，那就是日本殲滅了俄國自歐洲開去的艦隊的消息。他們住在運河的兩旁，因此看得見每一隻

滿載俄國傷兵駛回歐洲的船，一定是俄國戰敗了。過去我們東方有色民族，都受西方民族的壓迫，飽受痛苦，但却抬不起頭來。這次日本打敗了俄國，也是東方民族打敗了西方民族，日本人的戰勝也就是他們的戰勝，他們當然感到愉快和興奮了。這樣看來，日本的打敗俄國，豈非影響到亞洲全民族嗎？……日本戰勝俄國的結果，使亞洲民族產生了獨立的大希望，這種希望的產生迄今亦不過二十年，然而埃及的獨立早已成了事實，土耳其的完全獨立也成了事實，印度的獨立運動也在與日俱進，此種獨立的事實，係表示亞洲民族思想的最進步，此種進步思想的發達，達到極點之後，全亞洲的民族始能攜手，全亞民族的獨立運動始能成功。」我們讀了這一段說話。即可以明白孫先生的大亞洲主義的實質與內容了，他要全亞洲的民族，都要得到獨立自由與平等，要達到這個目的，就要從白種人羈縻之下解放出來。孫先生的大亞洲主義，就是全亞洲民族獨立運動的指導原則。

中國是亞洲的一部份，而且是亞洲文化發源的國家，舉凡博愛和平仁義道德等哲學，都是發生於中國古代的，經過數千年的淘養闡發，遂蔚成爲東方的王道文化。但近百年來，西方的功利主義日逐東漸，東方的王道文化，遂爲洋槍大砲所摧毀，中國隨着亞洲的命運，降而爲列強的半殖民地。所以孫先生很慨然的

說：「中國已經受過了列強幾十年經濟力的壓迫，弄到中國各地變成了列強殖民地。中國人至今還只知道列強的半殖民地，這半殖民地的名詞，是自己安慰自己，其實中國所受過了列強經濟力的壓迫，不只是半殖民地，比較全殖民地還要利害，比方安南是法國的殖民地，安南人做法國的奴隸。但是中國究竟是那一國的殖民地呢？是對於已經締結了條約各國的殖民地。凡是和中國有條約的國家，都是中國的主人，所以中國不只做一國的殖民地，是做各國的殖民地，我們不只做一國的奴隸，是做各國的奴隸。故叫中國做半殖民地，是很不對的。依我定一個名詞，應該叫做「次殖民地」。（民族主義第二講）中國受了列強的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侵略，已經是危亡無日了，所以孫先生提倡以三民主義來挽救中國，三民主義，就是中國革命的指導原則。

上述兩個原則的範圍雖有不同，但精神是一貫的，實行三民主義，以求中國之獨立平等，同時不能忘記亞洲諸國的獨立平等；實行大亞洲主義，以求全亞洲的獨立平等，同時，亦不能忘記中國本身的獨立平等，所以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與大亞洲主義的民族獨立運動，是具有連環性的。日人河野密氏現於三民主義與大亞洲主義曾作這樣的批評：「孫文的民生哲學之出現於民族主義上，將成爲中國民族的獨立強化，並全亞細亞民族的復興，而透過這大亞細亞主義以達到大同

的世界主義。他的民族主義是鑒於這樣的理想：民族主義並非只想強化中國民族，以威脅四鄰，乃想驅逐盤據於中國的歐美勢力，以實現亞細亞的復興，這是與歐美流的民族主義不同的原因。民族之理想的道義的精神，民族主義之頂點的大同主義——換句話說，東洋古來的民生哲學思想，似乎存在於三民主義的背後，如果站在孫文之理想的大亞細亞主義上，再回顧一下三民主義，則許多的懷疑豈不能立刻消除嗎？我們可以說孫文胸中所描寫的理想，是想先建設強盛的新中國，由善隣敦睦的政策，謀亞細亞的復興，並想解放在白種人羈絆下的亞細亞諸國，以實現大亞細亞主義。「他這種觀察是對的。我們一方面實行三民主義，以自求平等，同時實行大亞洲主義，以求其他民族的平等，這種思想，就是中國古代哲學的理想，所謂「己飢已溺」「疴瘵在抱」的襟懷，推而廣之，就是大亞洲主義的精神。孫先生闡述大亞洲主義，完全由這種理想爲出發的。如果亞洲各國覺悟到，亞洲爲亞洲人的亞洲時，則此種理想不難達到。日人小寺謙吉氏是信仰大亞洲主義的一人，在他的大亞細亞主義論一書中，述孫先生之言曰：「亞細亞者，爲亞細亞人之亞細亞也，中日兩國人民互爲親交，不惟應當除去猜疑，而且如輕信他邦人之說，互爲攻訐之弊。不可不斷然排去之也。亞細亞之和平，亞細亞人應有保持之義務，然中國現在，則乏維持之實力，故日本之責任非常重

大，余希望日本力圖中國之保育，而與中國互相提攜也。是不惟余一人之希望，恐亦爲全中國人所熱心期待者也。亞細亞爲吾人之一家，日本與中國，則一家中之兄弟也，假使此雙生之兄弟，有相闖之事，則亞細亞之一家，絕不能保持其和平，日本爲亞細亞最強之國，中國爲東亞最大之國，使此兩國互爲提攜，則不獨東洋之和平，卽世界之和平，亦容易維持，蓋無可疑者。所以大亞洲主義，不特爲中國人的理想，亦爲日本人的理想。如宮崎寅藏，犬養本堂，頭山滿翁及小寺謙吉等，均爲擁護大亞洲主義的健者。故可以說，大亞洲主義是中日共同的目標，也是全亞洲的共同目標，這種共同的目標，遲早都要實現的。現在時勢所趨，歐美對亞洲的經濟侵略，日漸加深，第三國際赤化亞洲的陰謀，日益加緊，在這種環境之下，中日兩國人士還不覺悟嗎？更兼經過兩年來的中日戰爭，已體驗到「相攻則兩敗俱傷，相親則共存共榮。」這是從痛苦經驗中得到的真理，此後東亞諸國應該澈底覺悟，惟有實行大亞洲主義，中日和平纔能成功，亞洲的獨立自主纔能出現，亞洲的復興纔有希望，東方文化的理想纔能達到，先哲們遺給我們的博愛和平仁義道德的偉大精神，纔能於廿世紀的世界文化史上放一異彩。亞洲的同胞們，我們要聯合起來實現大亞洲主義造成亞洲另一個新時代。

一九三九年耶誕

大亞洲主義之史的發展

子遺

關於近時汪精衛先生的和平理論體系的核心，我們可以歸納起來說：復與東亞是以日本所倡導的「東亞新秩序」必須與孫中山先生的「大亞洲主義」相符合爲前提的，即日本不能做照俄皇的大斯拉夫主義來製造東亞新秩序。因此之故，所以必須日本所倡導的「東亞新秩序」與孫中山先生的「大亞洲主義」相符合，然後中日共存共榮的意義纔不是中國的片面希望，而爲日本所同樣認識。按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等等的根本主張，固然經多年宣傳的結果，已是家喻戶曉，無須煩言，只有這個「大亞洲主義」並未印成專書，而因孫先生在世，時機尙未成熟，故雖言者諄諄，而聽者眇眇，並未發生顯著鉅大的影響；現在東亞的中日兩大獨立國既不幸彼此因陰錯陽差的打起來，糊裏糊塗的打下去，綜算前後，已有兩個整年還零幾個月了，大家都是氣竭聲嘶，焦頭爛額，自應勒馬懸崖，痛定思痛，想出一個長治久安的百年大計，汪精衛先生首先提出這個「大亞洲主義」實在值得我們關心中日兩國幸福前途的人應該特別注意，並使其發揚光大，希望將素來流行於中日兩國的狹隘排外，挑逗煽惑的種種短淺敵陋的邪說都一掃而空，此即是筆者所以要撰述本文的原故了。

說起大亞洲主義的產生，以時代而論，日本還算是「先知先覺」。日本因鑒於中國因禁止鴉片烟而被英國戰敗，成南京城下之盟約，大國威風尙且掃地以盡，那時日本猶不過僅是蕞爾三島，而英法俄美諸帝國主義者且相逼而來，苟不奮發自強，如何可以圖存？而「輔車之助」也是在所急需，故當時朝野上下都一致主張聯華，如會澤泊氏所著的「新編」就曾說過：

『若夫未嘗沐回回教羅馬教化者，日本之外，惟有滿清，當今之日本求唇齒之邦於宇內，舍滿清殆無有也。』

同治八年日本外務省在「致中國總理衙門書」裏也有說：

『……方今文明之化大開，交際之道日盛，宇宙之間，無有遠邇矣。我邦近歲與泰西諸國互訂盟約，共通有無，况鄰近如中國，宜最先通情好，結和親，而唯有商船往來，未嘗修交際之理，不亦一大闕典也乎？』

當時頑固守舊，眼光如豆的清吏像安徽巡撫英翰一流的人固然深閉固拒，以爲『日本向來爲臣服朝貢之國，非如英法各國曾經明定條約者比，令乘我之隙，而忽來嘗試，其心實不可問；中國所以應之者，關係極大，未可輕視，蓋日本即倭國也，有明二百年以市舶受倭之患，不減於今日之英法，一經縱入腹地，是於英法之外，又添一大患，不可不深思遠慮也。……』但比較開明，略有世界眼光

的李鴻章就能指斥其謬，以爲——

『日本向非中土屬國，本與朝鮮琉球越南臣服者不同。……前該委員柳原前光等來謁，每稱西人強偪該國通商，心懷不服，而力難獨拒，欲爲中國通好，以冀同心協力。……無論是否真心，立言亦似得體。……聞該國自與西人訂約，廣購機器兵船，仿製槍礮鐵路，又派人赴西國學習各色技業，其志固欲自強以禦侮；究之距中國近而西國遠，籠絡之或爲我用，拒絕之則必爲我仇。……』

他的老師曾國藩也說：『日本國二百年來，與我中國無纖芥之嫌，今見泰西各國皆與中國立約通商，援例而來請，叩關而陳辭，其理甚順，其意無他。……英翰杜絕之說，蓋未能合衆國而統籌，計前後而酌覈也。……以元世祖之強，與師十萬以伐日本，片帆不返；明覈倭患，蹂躪東南，幾無完土，卒未聞有以創之。彼國習聞前代故事，本無畏懼中國之心，又與我素稱鄰邦，迥非朝鮮琉球越南臣屬之國可比，其自居鄰敵比肩之禮，自在意中。聞日本物產豐饒，百貨價賤，與中國各省不過數日水程，立約之後，彼國市舶必將絡繹前來，中國買帆亦必聯翩東渡，不似泰西諸國，洋商來而華商不往。……』這樣看來，是日本政府與民間有識之士都久蓄亞細亞國家聯盟互助的志願，而清朝一二有力的封疆大吏

也具此同感，樂觀厥成。即在光緒五年三月十四日清廷所派出使英法大臣曾紀澤於倫敦與日本駐英公使尙有一次很懇摯的談話，據曾大臣的『日記』自述當時所說的話如下：

『歐羅巴諸國幅員皆不甚廣，所以能強盛者，同心一志以禦外侮，得古人合從之義。中華與日本皆在亞細亞洲，輔車相依，唇齒毗連，中華之富庶，日本之自強，皆歐人之所敬畏也。是宜官民輯睦，沉瀦一氣，中華財產足以沾潤於東鄰，日本兵力足以屏蔽於東海，邦交旣固，外患可泯，蓋不獨通商之利而已。』

同時又論及高麗琉球諸國事說：

『西洋各國以公法自相維制，保全小國附庸，俾皆有自立之權，此息兵安民之法，蓋國之大小強弱與時變遷，本無定局，大國不存吞噬之心，則六合長安，干戈可戢，吾亞細亞諸國大小相介，強弱相錯，亦宜以公法相持，俾弱小之邦足以自立，則強大者亦自暗受其利，不可恃兵力以凌人也。』

到了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年）曾紀澤對於俄人在朝鮮懷抱極大野心，仍主張聯日，據英文「馬格里傳」(The Life of Sir Halliday Macartney)所載曾使的信函有說：『西伯利亞鐵道的完成，由俄國得迅速集中其軍隊於高麗北境的結果，

將直接予高麗以危險，遑論我中國！吾人亦如日本已注意此鐵道之企圖。我希望我們能盡量準備一切，必要時得以應付裕如。……倘使高麗北境受侵略時，余無疑以爲中日兩國惟有訂一親善條款，以進於誠實互助之諒解。……」老成謀國，周密穩健，真可佩服。

最不幸因清廷的腐敗無能，日本深知當時即以全中國的兵力也不能防遏或抵抗歐美帝國主義的侵入，所以放棄聯華的企圖，「翻然改計，」採取「大陸政策，」於是舊時所提倡的「大亞洲主義」便「不絕如縷！」光緒二十一年李鴻章因中國海陸軍爲日本所敗前往馬關乞和，於第一次談判和伊藤博文相見，其問答節略還有如下的幾段記載：

「……李云：「亞細亞洲，我中東兩國最爲鄰近且係同文，詎可尋仇？今暫時相爭，總以永好爲事；如尋仇不已，則有害於華者，未必於東有益也；試觀歐洲各國，練兵雖強，不輕起釁，我中東既在同洲，亦當效法歐洲；如我兩國使臣，彼此深知此意，應力維亞洲大局，永結和好，庶我亞洲黃種之民，不爲歐洲白種之民所侵蝕也。」伊云：「中堂之論正甚愜我心，十年前我在天津時，已與中堂談及，何至今一無變更？本大臣深爲抱歉。」李云：「維時貴大臣談論及此，不勝佩服，且深佩貴大臣力爲變革俗尙，以至於此；我國之事，

囿於習俗，未能如願以償；當時貴大臣相勸云：中國地廣人衆，變革諸政，應由漸而來，今轉瞬十年，依然如故，本大臣更爲抱歉，自慚心有餘力不足而已！貴國兵將悉照西法，訓練甚精，各項政治日新月盛，此次本大臣進京，與士大夫談論，亦有深知我國必宜改變方能自立者。」伊云：「天道道無親，惟德是親，貴國如願振作，皇天在上，必能扶助貴國如願以償，蓋天之待下民也，無所偏倚，要在各國自爲耳。」……」

那時李鴻章所手創的海陸軍都「損失殆盡」，復仇的念頭當然戰勝「中日提攜」的「口頭親善」，加以劉坤一會上奏說：「日本之愚，沿海猶緩，東三省爲急，……第倭之強，非俄所願，倭之擾我東三省，尤爲俄所忌，……我乘此時與之深相結納，互爲聲援，並稍予以便宜，俄必樂於從我……。」張之洞也贊成此說，以「俄與中國乃二百餘年盟聘隣邦，從未開釁，……此次爲我索還遼地，雖自爲東方大局計，而中國已實受其益，日人兇鋒藉此少挫，……正宜乘此力加聯絡，厚其交誼，與之訂立密約。……」於是清廷便派遣李鴻章赴俄，完成這項使命，所謂「大亞洲主義」的思想在當時大概已不復存在於中日兩國人士的心目中了。惟「非吾族類，其心必異，」急不暇擇的清廷竟「認賊作友，」「引狼入室！」中俄祕約的墨汁未乾，而俄人已「翻臉無情，」強佔旅順、大連、且駭駭

焉要併吞朝鮮，囊括滿洲，致引起日俄兩國間的一場惡戰，結果日勝俄敗，「大亞細亞主義」的思想便復抬頭，孫中山先生曾自述當時的心境如下：

『……說到三十年以前，我們亞洲全部的民族思想便大不相同，以爲歐洲的文化是那樣的進步，科學是那樣的進步，工業上的製造也是那樣的進步，武器又精良，兵力又雄厚；我們亞洲別無他長，以爲亞洲一定不能抵抗歐洲，一定不能脫離歐洲的壓迫，要永遠做歐洲的奴隸；這種思想，是三十年以前的思想，是很悲觀的思想。就是從日本廢除了不平等條約之後，在日本雖然成了一個獨立國家，和日本很接近的民族和國家，雖然要受大影響，但是那種影響還不能一時傳達到全亞洲；亞洲全部的民族還沒有受大震動；再經過十年之後，便發生日俄戰事，日本便戰勝俄國，日本人戰勝俄國人是亞洲民族在最近幾百年中頭一次戰勝歐洲人；這次戰爭的影響，便馬上傳達到全亞洲，亞洲全部的民族便歡天喜地，發生一個極大的希望，這是我親眼所見的事。……』

按日俄正式宣戰，係在光緒二十九年的冬天，到了光緒三十年的冬天，僅僅相隔一年之間，日本的海陸軍均着着勝利，那時中山先生係由日本前往檀香山，取道美國，上歐洲去鼓吹革命，納納同志，所以先生自述：

『當日俄戰爭開始的那一年，我正在歐洲，有一日聽到東鄉大將打敗俄國

的海軍，把俄國新由歐洲調到海參威的艦隊，在日本海打到全軍覆沒，這個消息傳到歐洲，歐洲全部人民爲之悲憂，如喪考妣；英國雖然是和日本同盟，而英國人士一聽到了這個消息，大多數也是搖首縳眉，以爲日本得了這個大勝利，終非白人之福，這正是英國話所說 *Blood is thicker than water* 的觀念。不久我由歐洲坐船回亞洲，經過蘇彝士運河的時候，便有許多土人來見我，那些土人大概是阿拉伯人，他們看見了我是黃色人，便現出很歡喜的急忙的樣子來問我說：「你不是日本人？」我答應說：「不是的，我是中國人，你們有甚麼事情呢？你們爲甚麼現出這樣的高興呢？」他們答應說：「我們新得了一個極好消息，聽到說日本消滅了俄國新由歐洲調去的海軍，不知道這個消息是不是的確呢？而且我們住在運河的兩邊，總是看見俄國的傷兵，由一船一船的運回歐洲去，這一定是俄國打了大敗仗的景况。從前我們東方有色的民族，總是被西方民族的壓迫，總是受痛苦，以爲沒有出頭的日子，這次日本打敗俄國，我們當做是東方民族打敗西方民族；日本人打勝仗，我們當作是自己打勝仗一樣，這是一種應該歡天喜地的事，所以我們便這樣高興，便這樣歡喜。」像這個樣子看起來，日本戰勝俄國，是不是影響到亞洲全部的民族呢？那個影響是不是很大呢？至於那次日本戰勝俄國的消息，在東方的亞洲人聽到了，或者以

爲不大重要，不極高興，但是在西方的亞洲人，和歐洲毗連，朝夕相見，天天受他們的壓迫，天天覺得痛苦，他們所受的壓迫比較東方人更大，所受的痛苦，比較東方人更深，所以他們聽到了那次戰勝的消息，所現出的高興，更比較我們東方人尤甚。』

在這些「字裏行間」，流露出日本戰勝俄國一事是孫先生的大亞洲主義的主張的原動力，所以小寺謙吉氏在他的名著「大亞細亞主義論」一書便說過如下的一段話：

『……………彼孫文亡命時代，鼓吹革命，發表革命之六大綱領，（原註，明治三十九年——即光緒三十二年——夏在日本發表）其中有一綱領爲「主張中日兩國之國民的連合」云云。其後革命成立，渠爲中國無冠之主權時代，來游日本，我東亞同文會在華族會館開會歡迎之，孫氏在席上卽爲演說之一節曰：「亞細亞之西方有土耳其國，此國最近亦起革命，告厥成功，然現今却沈淪於悲慘之境遇，雖然，中國則不至蹈土國之覆轍，何也？亞細亞之東，中國之近鄰，有日本之強國，此強國爲中國之同文同種之友國，土國則無如是之強鄰，卽有強鄰，然在亞細亞之西方，可爲土國之後援之強國固不存在也，是爲中國革命爲土國革命相異唯一之點。……………要之，亞細亞者，爲亞細亞人之亞細亞

也，中日兩國人民互爲親交，不惟應當除去猜疑，而且如輕信他邦人之說，互爲攻訐之弊，不可不斷然排去之也。亞細亞之和平，亞細亞人應有保持之義務，然中國現在，則欠乏維持之實力，故日本之責任非常之重大，余希望日本力圖中國之保育，而與中國互相提攜也，是不惟余一人之希望，恐亦爲全中國人所熱心期待者也。亞細亞爲吾人之一家，日本與中國，則一家中之兄弟也，假使此雙生之兄弟，有相鬪之事，則亞細亞之一家，絕不能保持其和平；日本爲亞細亞最強之國，中國爲東方最大之國，使此兩國互爲提攜，則不獨東洋之和平，卽世界之和平，亦容易維持，蓋無可疑者云云。」以上所述，純爲大亞細亞主義論，亦可視爲曩日孫氏所宣布政綱之註釋也。或以爲是不過爲外交上之交換辭令，是或亦然，雖然，孫氏腦中，能有是等言詞之發出者，不能不謂孫氏自身認大亞細亞主義爲真理也。……」

這些話大體說的不差，但孫先生雖以中日提攜爲實現大亞洲主義的一種手段，而其目光所及却不祇限於中國和日本兩國，換句話說，孫先生對所有一切被歐美帝國主義者所壓迫的民族與國家，（特別是在亞洲）都是「痾瘵在抱」，寓有非常深厚的熱望與同情心，關於這一點，實非一般人所能望其項背。日本第一流鼎鼎有名的大政客中野正剛氏也極其傾倒佩服的說過：「當孫氏說到亞洲，同

時就提到安南，暹羅和印度，談論之間，其思考幾乎馳聘於全亞細亞，憤恨那些屈辱。那時作者（中野氏自稱）尙在中學校求學，對於常識的東洋史雖略有所聞，但是聽到以生存經綸的對象而暢談東洋者，於此尙屬初次。孫氏的談論，和基督開始說教一樣，聽衆悉被感動。孫氏的精神非常爽奔，他抬起頭來，浩浩然如唱詩歌；展開其獨創的見識，流露其經世的熱情，不僅是一個廣道博識的學者，更是一位實行的權威家，宜乎佔居中國革命的王座而堪稱人中之傑了。他說到大亞洲主義時，在其大亞細亞的先覺者的立場上，對於中國，日本，印度等，認爲沒有什麼差別的。……」（見氏所作「日德義三國同盟與中日事變之處理」一文，載本年七月份的中央公論）這些非常恭維的話在事實也並不算是十分溢美的。

按當時日本人士同情孫先生的主張的，實在大有人在，如宮崎寅藏，犬養毅、平山周、平岡浩太郎、中野德次郎、內田良平、福本日內、末永節、清藤幸七郎諸氏，或從事財政上的資助，或代爲籌劃帷幄，（參看吉野作造氏所著「對支問題」一書之「日本人對革命的援助」一段即第三十八至五十二頁）別的人現且無暇去說，只以最負盛名的宮崎寅藏而論，他在「三十三年落花夢」一書即曾追述他的二兄對他說過：

『若支那得光復，則印度可興，暹羅安南可振，菲律賓埃及可救也。至如法蘭西、美利堅，則民族帝國主義之梟傑，其國民雖高尚，吾不欲見之。夫汝欲恢復人權，奪回權利，使我黃人，爲有名譽之種族，轟轟烈烈，建新紀元於宇宙間，捨此以外，無可求也。』

這兩位「難兄難弟」的精神都是極使人感動的，所以孫先生在所作的「三十年落花夢序」極端讚美說：『……宮崎寅藏君者，……日憂黃種陵夷，憫支那削弱，數遊漢土，以訪英賢，欲共建不世之奇勳，襄成興亞之大業，聞吾人有再造支那之謀，創興共和之舉，不遠千里，相來訂交，期許甚深，勸勵極摯。……』（參看「孫中山全集」第四集「序文」第四頁）又據戴天仇氏所作「我的日本觀」一文自述「民國二年的春天，總理中山先生特地訪問日本，那時我隨從總理作祕書。……那一年在東京四十天的當中，最值得我們記憶的，只有一件事，就是中山先生和桂太郎公爵的會見。桂太郎這一個人，大家都曉得，他是日本軍人政治家當中，最有能力而當權最久的一個人。……他第一次組閣，是明治三十四年（光緒二十七年）六月到三十八年（光緒三十一年）十二月。在這幾年當權的當中，他所幹的兩件最重大的事情，就是日英同盟和日俄戰爭。從外交史上看，大家都曉得英國是標榜「名譽的孤立」的，在百年以來，英國沒有和任何國家，締結過

同盟。這一次把百年政策之一的「耀譽孤立」拋棄了，和日本聯盟，這自然是他認爲有民族與衰國家存亡的大關係，纔肯出此的。至於日本，以一個東方新興的國家，纔從不平等條約的束縛下面，解放了不過十年，便和世界第一個強大的帝國結成攻守同盟，造成她戰敗世界第一大陸國家的歷史，這真是日本民族最大的奮鬥成功。不特此也，這一件大事，可以說把全世界都整個推動了。由日本戰勝的結果，打破了東方民族不能戰勝西方民族的催眠術，全東方的民族，都活潑潑地動作起來，世界民族革命的新潮，從此開始。……桂太郎的事蹟，世間所知者大都如此，而不曉得他在日俄戰爭之後的計畫，更屬可驚。他的高識遠見和通權變達，的確不是日本現在一切政治當局所能望其肩背的。在中國排滿革命成功之後，他特意派人來對中山先生表示親近的意思。及中山先生到了日本之後，那時他正是第三次組閣的時候，他特意約中山先生密談兩次。這兩次密談的當中，他和中山先生都可算是盡傾肺腑的了。而自此以後，桂太郎之佩服中山先生和中山先生之佩服桂太郎。都到了極點。兩人之互相期望，也到了極度。桂太郎死後，中山先生嘆氣說：「日本現在更沒有一個足與共天下事的政治家，東方大局的轉移，更無可望於現在的日本了」。當桂太郎臨死的時候，他對在旁視疾的最親信的人說：「我不能倒袁扶孫，成就東方民族獨立的大計，是我平生的遺恨。」由

這兩個人的感情上，大家總可以了解桂太郎的心胸和氣魄了。何以一個帝國的大軍閥領袖，一個民國開國的革命領袖，一個軍國主義的權化，一個三民主義的宗師，會如此互相諒解呢？他們兩人的互諒和互信，不是在學術思想上，不是在國家思想上，而是在以東方民族復興爲根據的世界政策上。桂太郎和中山先生密談，前後約計十五六小時，桂太郎的話的要點，我可以記出來：

『在清朝的時代，東方的危險，固然到了極點，同時失望也到了極點，那樣腐敗的朝廷和政府，那裏還可以有存立發展的希望。而西方的勢力，尤其是軍國主義大陸國的俄國，以最強的武力從北方壓迫下來，海上霸王的英國，以最大的經濟力從南方壓迫上來。這個時候的日本，除了努力圖自存而外，更無他道。而自存的方法斷不能同時抗拒英俄，幸而英俄兩國的亞洲的地位，立在極端衝突的地位，使我得以利用英俄的衝突，和英國聯盟，居然僥倖把俄國打敗了。俄國這一個敵人，不是東方最大的敵人，而是最急的敵人。打敗了俄國，急是救了，以後的東方，便會變成英國的獨霸。英國的海軍力，絕非日本之所能敵，而英國的經濟力絕非日本之所能望其肩背。我在日俄未戰之先，極力想法造成日英同盟。現在日俄戰爭的結果既已分明，而日英同盟的效用完全終了。此後日本絕不能聯英，而英國更不用聯日。在太平洋上，英日兩國完全

立於敵對地位。此後日本惟一之生路，東方民族唯一之生路，惟有極力遮斷英俄的聯結，而且盡力聯德，以日德同盟繼日英同盟之後，以對英作戰，繼對俄作戰之後，必須打倒英國的霸權，而後東方乃得安枕，而後日本乃有生命。此生命問題，非獨日本從韃靼海峽到太平洋，全部東方民族的運命皆以此計劃的成敗而決。現今世界只有三個問題，土耳其印度中國是也。此三國皆在英國武力與經濟力壓迫之下。然而只須解除其武力的壓迫，則經濟力之壓迫完全不成問題。蓋此三國皆真可以成最富的生產國之要素，此三國皆不能爲日本助。中國有可以爲日本助之道，而此數十年來，內政既不修明，利權復任意放棄，且持其遠交近攻之策以臨日本。中日之戰，中國若強，則絕不會有日俄之戰，中國若強，則應爲中日俄之戰，或中俄之戰，而不至以此犧牲歸之日本，我可斷言。此兩戰者，日本不過以人民死生拚國家存亡，豈足以言侵略？若中國不強，而甘受歐洲的侵略，且將陷日本於死亡，是可恨耳。『我有鑒於此，故前年有俄都之行。余之赴俄，世間謂余將作日俄同盟，余誠欲修好於俄，然同盟何能成？成又何用？我所計畫者乃是日德同盟。我因既不能以此事假手於人，又不敢赴德國，惹人注意，故與德政府約在俄都討論政策。乃剛到俄都，先帝病篤，連以急電催回，事遂一停至今，真是一個絕對大恨事。但我一日握政

權，終必做成此舉。此爲余之最大祕密，亦爲日本之最大祕密。倘此事有半點洩漏，日本將立於最不利的境地。在日德同盟未成之時，而英國以全力來對付，日本實不能當。我剛纔聽見先生所論，所勸告日本之策略，不期正爲我志。我在日本國內，從不曾得到一個同志，了解我的政策。今日得聞先生之說，真大喜欲狂。中國有一孫先生，今後可以無憂。今後惟望我兩人互相信託，以達此目的，造成中日土德奧的同盟，以解決印度問題。印度問題一解決，則全世界有色人種皆得蘇生。日本得成此功績，決不愁此後無移民貿易地，決不作侵略中國的拙策。對大陸絕對的保障，而以全力發展於美澳，纔是日本民族生存發展的正路。大陸的發展是中國的責任。中日兩國聯好，可保東半球的和平，中日土德奧聯好，可保世界的和平，此惟在吾兩人今後的努力如何耳。

現在中國的境遇如此，國力又不堪用，先生的羽翼又未成。剛纔所云助袁執政云云，以我所見，袁終非民國忠實的政治家，終爲民國之敵，爲先生之敵，今日之爭，殊無益而有損。如先生所言，目前以全力造成鐵道幹線，此實最要的企圖。鐵道幹線成，先生便可再起執政權，我必定以全力助先生，現今世界中足以抗英帝國而倒之者，只有我與先生與德皇二人而已。」（參看「

戴季陶文存「第三編第一二六至一二三二頁」

這確是關於「大亞細亞主義」的發展的一篇很重要的文字，尤其足以代表當時日本最有遠見的陸軍方面首腦的見解，畢竟與其他富於「優越感」的日本軍人的狹隘的眼光大有不同，故其理由的正大，措詞的懇摯，胸懷的光明磊落，雖在二十七年後的今日讀之，猶覺「凜凜有生氣！」當時即在日本海軍方面，如秋山真之中將也以爲『日本人的運命在美洲澳洲，但是要達到這個目的，除是土耳其印度中國三個大民族都完成了獨立，打倒了英美的霸權，要海上的自由完全實現之後，諸大陸的移任自由纔能實現，所以他在這個論據之下，極力盼望印度的革命成功。他認爲印度的革命成功是東方民族復興的總關鍵。如果印度的革命不成，其他的一切努力，都不能完全有效。他在這種觀點的下面，和總理（孫中山先生）成了很好的朋友。』總之，這幾個「叱咤風雲」的人物，都是「大亞細亞主義」的「先知先覺」。此外如胡瑛氏也曾撰文說：『現在之中國，不過造成革命之第一步耳，共和甫建，內政未能整理，外交未能刷新，社會風教之諸問題，產業貿易之諸問題，法制軍制之諸問題，待爲整理之事業，指不勝屈，前途尙爲遼遠，故苟欲維持東亞之大勢，而達到亞細亞人之亞細亞之理想，則中日兩國，在東亞之地位關係與責任，自然明瞭矣。……試觀亞細亞諸邦，土國之命數，懸

於一髮，波斯暹羅印度皆極不振，足以雄飛之國家，蓋寥若晨星，惟日本則爲世界的國家，且爲亞洲諸邦之先進國；中國現今，正欲效日本而奮起者也。或有悲觀中國之運命者，余斷然信其非是，中國之盛衰，關係東亞之興存，故中國與日本，對於解決東亞問題，實有大責任也。所以中日兩國誠能疏通意思，各捧熱誠，以當時艱，進而爲一致之團結，而結經濟上之攻守同盟，則不特能舉二國利害共有之實，而吾人所稱新時代，亦將實現，又使東亞諸邦，完全存在。……」（見支那雜誌第四卷第六號）胡氏雖爲籌安會的「帝制遺孽」，但也不能「因人廢言」。民國五年七月二十五日那位與孫總理「齊名」的黃克強先生在上海徐園招待日本朝野名流，曾有一篇演說道：「……余曩在美國研究彼邦之一切事情，美國在西洋各國中，爲最重自由之國家，然對於東洋人士，則壓迫無所不至；不獨中國國民苦其壓迫，即日本人亦甚苦之。美國對於東洋，既執如是態度，其他西洋諸國，可以類推，可知東西兩人種之間壁，到底不能除去也。歐洲諸邦，目下在戰亂渦中，對於東方事件無暇染指，然大戰終了後，東漸之力，再將增大，中日兩國對於禍亂幸無直接之關係，故在今日不可不豫爲研究戰後之處置方法也。……」（見「大亞細亞主義論」第五章第六三四頁）誠然我國大多數的人民都認美國是惟一的好友，最能「雪裏送炭」，「患難相助」，伍廷芳博士曾說：「美國

大有造於東方者也，而於吾中國爲尤甚。……溯吾中國門戶開放之始，……與西方之民常扞格而不相入，爭端時起，違言常聞，馴至戰釁之開，亦非一次，然中美之間，固未嘗一次以兵戎相見也。……且美國略無利吾土地之心，此又爲國人所共信；拳匪之亂，美國首創維持中國門戶開放主義，而保全吾內地之安全。……但美國雖常標榜什麼「天賦人權」，「解放黑奴」等等好聽的「主義」「名詞」，而自前清咸豐五年以來直到光緒二年（西歷一八五五年至一八七六年）二十年間，美國乘中國發生太平天國及英法聯軍與捻回等的亂事，國內「片土不甯」的時候，就欺侮凌辱那幾萬「漂泊海外」「顛連無告」的華僑，那種情形簡直「慘無天日」，所以伍博士雖有「親美派」之稱，也在指責美國人說：『以一千八百六十八年倍林格姆條約而言，則美政府固嘗許中國人以遊歷住之權，而允其享與優待國人民同等之權利矣，……故現行之繼續禁止華工及限制中國商人與他色人等之來美，不特出於國際權能以外，且大背乎條約之規定矣。若夏威夷與菲律賓羣島之華工禁約，則尤其無理者也。美國本土之禁華工，猶曰華工之來，有害於白工，而由工黨提出反對之怨言者也，若夏威夷與斐律濱，則曾不聞有是等之怨言；甯特無之，夏威夷華工之禁約，且違反其當地人民政府之意向者也，中國與此羣島間之自由移殖，蓋已數百年於茲矣。』其實美國的排華，還不僅僅限於其本土及殖民

地，且煽動中南美兩洲的國家，如古巴祕魯墨西哥等處的華僑即受害最爲猛烈，截止到現在，都還沒有良好的解決辦法；而其影響所及，則普遍於全世界，如美洲的加拿大阿根庭薩爾瓦多智利多明尼亞等國，太平洋的法屬大溪地與英屬薩摩島，南洋英荷法屬羣島及安南暹羅，澳洲的紐絲倫紐堅尼，南非洲的杜省亞等地都先後頒布摹倣美國辦法的「苛刻無比」的取締華僑的法令條例。（參看王闢塵編「各國待遇華僑苛例概要」一書）這樣無怪伍博士也不勝感慨的說：

『……余論西方民族開闢新土之非計，嘗言白人可以自由移植，不加限制，然此惟白人能之，吾黃種則不然。有數國僅許白人生殖，取締黃人入口條約至爲嚴酷；且其法律規定，黃人住居雖久，不能認爲國民，且有數處完全禁止黃人之移植，主此政策者，其意謂白人之智識教育風俗習慣，皆高出黃人之上，若黃人者，實不值與之相接觸者也，然黃色民族若中國者，有禮儀，有藝術，有倫常，且其經營良好鉅大之社會者已數千年於茲，如社會上階級之仇恨，階級之界限，階級之競爭，在西方爲阻滯進化之機者，中國從未有之，且復能愛金錢而不爲金錢之奴僕，喜奢逸而不沈溺於奢逸，樂生命而不營逐於末節，誠所謂樂天安命之民族，若吾顏色之不同，則亦如語言之不同，然所謂物質之偶有性，根於風土氣候及其他遠因，而最初固皆出諸一本者也；遠始之時，天無

偏愛，吾人固均一而無別，後此之差異，則人自爲之。且以才智論。吾黃人未嘗有較遜白種之處也，日俄之戰，黃人才智不較勝於白人耶？故余嘗謂亞細亞當再以文化灌溉西方，此非無聊之辭，漫相嘲諷已也，誠以白種人當受教於有色種之同胞者，其事尙多，如印度中國日本等，其優美之制度，多有非亞洲以外民族所能知者；宗教於西方文化，影響甚微（？），而亞洲文明，則無不以宗教爲社會之基礎，究其所詣，則有色種人處置道德問題之地位，崇實之白種人，則以之處置其經濟問題；以吾人之思西方，白種人直若不解安樂爲何物者，其故蓋以白種人實無享受安樂之餘閒，終日營營，惟以聚財爲人生之標準，不若吾人之以道德爲標準也。家庭之維繫，有色種人亦較無責任之白種人尤爲強固，因之而社會之感覺，較爲敏銳，個人之受苦亦於以減少。雖吾人要亦不能免缺陷不足之處，然非獨具之劣點，而以通體而論，柔和之風，實爲中國人所特長。……」（參看陳政譯「美國視察記」第四章及第十二章）

伍博士拿這些「大而無當」「不着邊際」的話去和那些自命爲「天之驕子」人種成見極深的安格羅撒克遜民族去說，簡直不啻是「對牛操琴」，如「秋風之過馬耳！」有何益處？博士又以「美人恆自號於衆曰：『美國者，美人之美國也。』」澳人亦恆曰：「澳洲者，澳人之澳洲也。」然以理論言，二說皆無所根據，

蓋美澳二洲，非今茲美澳之人所固有；若吾東方人亦爲此論調曰：「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日本者日本人之日本，」於義似較爲確切。……」（參看「美國視察記」一書）不錯！我們亞洲受侵略搾取的民族國家都應該一致聯合起來，使亞洲成爲亞洲人的亞洲。那位曾「徵引東西書籍至百餘種」，撰成「洋洋數百萬言」的「大亞細亞主義論」的小寺謙吉氏即在卷首序文「大聲疾呼」的道：

「異哉！吾聞哲人之叫囂乎黃禍，而未聞黃人之唱白禍也！彼耽耽逐逐併印度，滅安南，而欲席卷亞洲者，非哲人也耶？黃禍者夢嚙耳。西鄰舊國，今且爲俎上之肉矣，騰騰山河，源源寶藏，乃反以階厲而徠災，茫茫禹域，遂或見蝕于財，或受劫於力，所謂麀臍象齒，自焚其身也，吁嗟乎白褐哉！使坤圖之土，中國之名有去之一日，則斃斃子立於哲人間者，非祇日本也耶？餘皆受制於哲人矣，言念及此，甯不寒心？昔晉以寶玉名馬假道於虞伐虢，虢亡虞隨之，假日本與哲人伍，並力而亡中國者，其不爲虞續也幾希？

今者統一民族，乃世界之趨勢，不可遏者，若全美主義，大不列顛主義，英語國民統一主義，大俄主義，大德主義，大拉丁主義，皆其最著者也，蓋族類不同，則情感自異，而情感之厚薄，恆視其關係之親疏，以爲等差，然則大蒙古主義，勢不得不倡已；而吾所謂大蒙古主義者無他，黃色人種聯合論是

也，蓋中日兩國誠能相提挈，相親睦，因以啓其富源，導其民衆，於是中國之復興改造，庶可有期，而遠東和平，福祉增進，亦庶可得，而各國且並受其賜矣。夫民不富則文不興，國不强則化不行；今日調和東西文明，煇化黃白思想者，斯中日兩國共有事也，使日本果得因中國之惠而獲其富財，中國賴日本之力克致其治，則兩利之效，斯可舉矣，此則大亞細亞主義之第一步也，何則？因是之故，中日兩國得以其所集成調和映發之新文明，以化亞洲，多其利澤者，乃大亞細亞主義主之正鵠也。

世有嗜大亞細亞主義爲人種感情之偏見者乎？是乃歐人作之俑者，非吾尤也，彼哲人之唱言黃禍，與夫新大陸之慮遇黃人，非其明徵也耶？是故吾人雖唱白禍而言大亞細亞主義，以視哲人之暴狠，不可同日而語矣，何者？吾爲守而彼爲攻，吾爲退而彼爲進也。……」（參看漢譯「大亞細亞主義論」卷首第三至第六頁）

此書出版於大正五年（民國五年）的到了民國七年百城書舍纔譯爲漢文，當時中日因外交問題感情頗爲惡劣，所以竟不發生什麼效力。民國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孫中山先生由廣州北上途經日本會對神戶商業會議所等五團體演講「大亞細亞主義」說：

『……今天大家定了一個問題，請我來演講，這個問題是大亞洲主義。我們要講這個問題，便先要看清楚我們亞洲是一個甚麼地方？我想我們亞洲就是最古文化的發祥地；在幾千年以前，我們亞洲人，便已經得到了很高的文化；就是歐洲最古的國家，像希臘羅馬那些古國的文化，都是從亞洲傳過去的；我們亞洲從前有哲學的文化，宗教的文化，倫理的文化 and 工業的文化，這些文化都是亙古以來，在世界上很有名的；推到近代世界上最新的種種文化，都是由於我們這種老文化發生出來的。到近幾百年以來，我們亞洲各民族纔漸漸萎靡，亞洲各國家纔漸漸衰弱，歐洲各民族纔漸漸強盛起來：到了歐洲的各民族發揚，和各國家強盛之後，他們的勢力更漸漸侵入東洋，把我們亞洲的各民族和各國家，不是一個一個的消滅，便是一個一個的壓制起來，一直到三十年以前，我們亞洲全部，可以說是沒有一個完全獨立的國家，到那個時候，可以說是世界的潮流，走到了極端。……從日本戰勝俄國之日起，亞洲全部民族便想打破歐洲，便發生獨立的運動，所以埃及有獨立的運動，波斯土耳其有獨立的運動，阿富汗阿拉伯有獨立的運動，印度人也從此生出獨立的運動，所以日本戰勝俄國的結果，便生出亞洲民族獨立的大希望；這種希望從發生之日起，一直到今日不過二十年，埃及的獨立便成了事實，土耳其的獨立也成了事實，波斯

阿富汗和阿拉伯的獨立也成了事實，就是最近印度的獨立運動，也是天天發達，這種獨立的事實，便是亞洲民族思想在最近進步的表示，這種進步的思想發達到了極點，然後亞洲全部的民族纔可聯絡起來，然後亞洲全部民族的獨立運動，纔可以成功。近來在亞洲西部的各民族，彼此都有很親密的交際，很誠懇的感情，他們都可以聯絡起來。在亞洲東部最大的民族，是中國與日本，中國同日本就是這種運動的原動力，這種原動力發生了結果之後，我們中國人此刻不知道，你們日本人此刻也是不知道，所以中國同日本，現在還沒有大聯絡，將來潮流所趨，我們在亞洲東方的各民族，也是一定要聯絡的。東西兩方民族之所以發生這種潮流，和要實現這種事實的原故，就是要恢復我們亞洲從前的地位。……」（參看「孫中山全集」第四集第二二四至二二九頁）

孫先生雖「數十年如一日」毫不倦怠的宣揚他的卓見，但不幸「革命未成身先死」，中日又常發生磨擦，所以這次的演講，眼光短淺的人仍以爲不過僅是非短時間所能希望實現的「高調」，結果自然不會產生鉅大的影響，殊爲可惜。最有趣如前面所引那位在現時最恭維傾倒於孫先生的卓識遠見的日本的「負一代人」望的大政治家中野正剛氏也在他的「孫文君的去來與亞細亞運動」一篇演說詞裏，不免多少帶着幾點譏笑的口吻說：

「……孫君所講的與日本的所謂大亞細亞主義的立論的根據全然歧異，日本的「大亞細亞主義」是聯合亞細亞從人種的皮膚顏色上與白人應戰，而又以日本爲中心對抗白人的帝國主義，有從新造成另外一個「別開生面」的帝國主義的傾向。在相反方面，孫君却不過只反抗以英美爲「執牛耳」的「霸者」的帝國主義，故主張先聯合被白人帝國主義所侵害的亞細亞諸民族，更與白人中之被宰割者如蘇俄及德意志諸國互相結納，此種主張是根據於「世界大同」的思想而將演出的解放戰爭。

「日本的大亞細亞主義的信徒，以舊式的人物爲最多，他們對於亞細亞有像宗教一般樣的「狂信」，在人種方面又極端嫌忌白人，所以要結納蘇俄以之爲國際策略上利用的工具，真是非常的慄懼恐怖而又很深惡的閉拒的。

「像孫君等那樣反對英美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新人物裏大有「車載斗量」之勢。他們並不如我們日本的「國粹主義者流」妄於過信亞細亞的一樣，他們對亞細亞母甯說不很看得起，所以非常痛嘆亞細亞的「不成器」，沒有多大出息。他們並不憎惡白人，不過對白人的專制却很氣憤，正因爲不滿意這種白人的經濟的帝國主義，所以纔去拉攏那些被欺負壓迫的白人一起出來破壞白人的獨霸天下。」（參看「中野正剛大演說集」第十七至第十九頁）

他對於中日兩國人士所主張的『大亞細亞主義』的歧異之點，不能說不有精細的分析和比較，但據前引戴傳賢所述桂太郎公爵和孫中山先生的談話，就曾說過：『…此後日本唯一之生路，東方民族唯一之生路，惟有極力遮斷英俄的聯絡，而且盡力聯德，以日德同盟繼日英同盟之後，以對英作戰繼對俄作戰之後，必須打倒英國的霸權，而後東方乃得安枕，而後日本乃有生命；此生命問題，非獨日本，從韃靼海峽到太平洋，全部東方民族的運命，皆以此計劃的成敗而言。』從這些話看來，可知就是舊式信仰『大亞細亞主義』的日本人如桂太郎公爵那樣的人，也曾計劃過聯絡白人裏頭的德意志國，是中野正剛氏所說的話，已犯了論理學上「不周圓」的毛病。又按以日本為「大亞細亞主義」的中心，當做是日本人的「大亞細亞主義」的特色，與中國人所主張的「亞洲各民族都是平等」的各不相同，這話也恐不盡然，試看小寺謙吉氏就曾以日本人的資格講了像下面的一段話：

『…黃色人種中，名實相符，具有獨立國之體面者，僅有日本中國二國耳：一為亞細亞之新進國，一為世界中經營最大團體生活之龐大國也，義當互相提攜，理當互相扶護，為全亞細亞計，為一般有色人類計，不得對抗白色人種之迫壓也。…』（參看漢譯「大亞細亞主義論」第一六一，二兩頁）

這裏何嘗有點：「以日本爲中心」的意思？經過這兩年多的血戰與慘痛的犧牲，中野氏也深深覺悟『日本對於中國，過去屢屢失信，失去智仁勇信嚴全部的對華外交，可說是無智，不仁，懦弱，不信，和優柔的綜合物，』因氏承認孫中山先生的「大亞洲主義」的理想實堪敬畏，這不能不說是爲此次東亞曠古所未有大規模的戰爭的一種收穫物了。

對於大亞洲主義的認識

胡蘭成

汪先生的論文『我對於中日關係的根本觀念及前進目標』，其重要之點是指出了和平的積極性。一般人對於和平的觀念，多是把它看作無可奈何，打不過則和，吃虧也沒有辦法，總比亡國滅種好些。這種看法，完全是消極的，是把和平當作一杯苦酒，既然自己斟上了，只好自己喝完它。在一幅和平的圖畫裏的中華民族，是慘淡的，鬱怒的。並且從這裏產生出兩種心理，一種是完全被慘淡的景色所壓倒了，對於和平之後復興亡國的命運感覺渺茫，黑暗。這一種心理如果普遍了，戰後的中國，就會發生五胡亂華時代那樣的頹廢與不負責任的風氣。另一種心理是，完全被鬱怒的情緒所壓倒了，以為戰後的中國要想復興，只有「找機會向日本報仇」。這一種心理如果普遍了，此後中日兩國便只有走上普法戰爭的結果那樣循環報復不已。

為什麼會把戰後的中國看作這樣慘淡，這樣鬱怒呢？就是因為他們沒有看到和平的積極的一面。這積極的一面就是戰後中日兩國本着共存共榮的精神，負起復興東亞的責任，在復興東亞之中走上復興中國這一條大路。這也就是汪先生所啓示我們的。這一幅擺在我們面前的圖畫是光明燦爛的，沒有感傷，也沒有鬱怒

的氣分。

可是汪先生的主張最需要解釋的也就是在這一點上。現在很有人同情和平，但是對中日共存共榮之說起反感，不然也以爲這不過是解嘲。但汪先生說中日議和應當避免普法議和那樣的循環報復，是以中日議和必須平等爲前提的，即日本不能像普魯士對待法國那樣來對待中國。汪先生說的復興東亞，是以日本所倡導的東亞新秩序必須與總理的大亞洲主義相符合爲前提的，即日本不能做照俄皇的大斯拉夫主義來製造東亞新秩序。必須日本所倡導的東亞新秩序與總理的大亞洲主義相符合，中日共存共榮的意義纔不是中國的片面希望，而爲日本所同樣認識。必須中日皆有此認識，而後雙方纔有平等議和之誠意。汪先生的和平理論體系的核心在此，汪先生所必堅持的談判具體條件的依據亦在此。

中國人必須認識，外交的權謀術數只能醞釀危機，擴大矛盾。中國要想利用英國牽制日本，是一條走不通的路；因爲英國是在退却中，英國人自己說過，中日戰爭不過觸及了大英帝國邊緣，在退却中着着放棄的就是邊緣。中國要想利用美國牽制日本，也是一條走不通的路，因爲美國雖然是在進取中，但要是我們真能煽動美國和日本開戰，那時候中國會變成什麼呢？變成塞爾維亞。奧國進攻塞國，幸得協約國出來干涉，而且釀成大戰，這於塞國有什麼益處呢？在遠東，無

論是英美俄，要是她們之中有一個和日本動武，結果就會是世界大戰，在這個世界大戰當中是列強能夠驅遣中國呢還是中國驅遣列強？稍有頭腦的人都可以明白的。何況這個希望都不能實現，因為歷史上只有強國授意或壓迫弱國去打世界大戰的頭陣，弱國可不能請求或煽動強國去發動戰爭或者參加戰爭。眼前我們就是聽到中國是為英國而戰，為保衛蘇聯而戰，為維持美國的九國公約而戰這一類說話。終不見有英國，蘇聯，或者美國為中國的獨立自由而戰。這難道還不夠使我們醒悟嗎？若說是僅僅希望英美以調停的方式來抑制日本的過份要求。那麼，過去八國聯軍之役就是一個好教訓。當時中國賄賂俄國並且賄賂日本幫中國說話，結果如何呢？賄賂只成了額外損失。現在呢，說來痛心，一邊是淪陷區，一邊是重慶政府。在淪陷區，因為我們還沒有一個統一的主持和議的機關，與日本就地交涉，權益之損失已經很大。而在重慶政府，由於依賴更由於賭氣，草草斷送權益，已成江河日下之勢，據聞最近進行向列強借款，為數不過一千萬鎊，由某某兩國各出五百萬鎊，中國則以出讓雲南全省鑛權為代價。這種局面多延長一天，日後復興中國的基石便多耗損一塊。我們將來還要做人，我們的子孫將來也還要做人的，我們不能眼看五千年來國家民族的遺產一下子就被化費得精光，要講和，就要講得快。

與日本議和，我們必須認識日本的地位。只有日本與中國共存共榮，遠東的和平纔能長久保持。稍有頭腦的人都不願意這次對日戰後再被捲入世界大戰，而且担心議和條件中的中日軍事外交政策一致。將來會弄到中國被日本驅使去攻打蘇聯或英美。其實中日要是能夠像英法那樣合作，遠東在整個國際上的影響就會和現在的大不相同。只有中日合作。纔能增加亞洲的重量，這個重量，即使不夠制止世界大戰，但有可能做到中立。這於人類便是一個偉大的功績。

其在日本的政治家及其人民，則必須認識中國的地位。現在沒有那一個國家可以滅亡中國，這一層日本經過兩年來的戰爭，也已經從經驗上明白了。而且也沒有那一個國家可以劫持中國。誰劫持中國，大亂子就會爆發。英國利用中國施行貨幣政策的機會，想從金融上支配中國，結果英美起了衝突，而英日倫敦談判關於華北投資合作問題的破裂，也就胎息於此。蘇聯想要支配中國，成了中日戰爭延長的主要原因之一。中日戰爭一延長，中國固然倒霉，然而遠東方面反共同盟的形勢也就一天比一天成熟起來。日本想要支配中國，她雖然不怕英國，然而對於美國方面來的隱憂則正在加重，成爲日本外交家最難措手的問題。中國既然不是可以被滅亡的，而且不是可以被支配的，然而中國是可與合作的。明白這一層道理的最早要算美國。美國領導的華盛頓會議及九國公約，她的方針便是扶植

中國之自由獨立，只有自由獨立之中國，纔能不被英國或日本利用以爲阻難美國的工具，美國在中國之歷史基礎雖遠不及英日，但是靠了這個方針，居然進展了許多。要是日本也採取這樣的方針，幫助中國從列強的支配之下解放出來，其成就一定會比美國的更大。在歐洲，能夠幫忙英國的現在只有法國，能夠幫助德國的只有意大利，在遠東，能夠幫忙日本的只有中國。要是法國是西班牙那樣一個不爭氣的國家，或在簡直像印度那樣只是英國的一個殖民地，試問英國在對付德意這一層上將會感到若何困難？意大利要是只有像匈牙利或者希臘那樣的地位，德意軸心也就建立不起來了。至於中國，她一天陷在半殖民地的地位，她便一天依賴英美以與日本對抗。只有獨立自由繁榮強盛的中國，才能成爲日本的有力的朋友。只有中日兩個有力量的國家相結合，遠東對歐美的比重纔會增加，有如美洲之於歐洲。

中日兩國人民及其政治家只有根據這種認識，中日和平的原則纔能確立，復興東亞，復興中國，以及挽救日本戰後的危機，纔能找到一條正確的途徑。

敬告懷疑「大亞洲主義」者

程獨清

謹按東亞兩大獨立國家——中國與日本——雖號稱同文同種，但因時勢的推移，早已不能保持那種在二千年前隋唐時代的「潔白無疵」的「國際關係」與彼此人民間的「私人關係」，尤其在最近五六十年內更跟愈下，大有以兄弟之邦內關於牆而外不禦侮的趨勢，到了兩年以前盧溝橋事變暴發，而這幕「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悲劇直連台上演至不知何年何月何方可收束下場？這不惟中日兩國有識之士所共引為再煩悶不過的事，即歐美各國留心東亞局勢變更的人也很以為不可思議，例如英國眾議院的保守黨議員韓拿氏 I. G. Hannah 在一九三八年（民國二十七年）二月二日即曾有一篇演說，很懇摯的表示他的對於中日關係的懷疑，如說：

「我們西洋人都很感覺慚愧，千百年來中國和日本相處得很好，從我們歐洲人移殖到東亞之後，他們兩個國家差不多就永久都在戰鬥之中。 the Shame we all fee that while for many centuries Chira and Japan got on exceedingly well together, since the Europeans have been there, they have been almost constantly at war.」

敬告懷疑大亞洲主義者

在事實上，當歐洲人初來侵略中國的時候，滿清政府的無能與腐敗沓泄，固已引起鄰邦日本人的輕視，如梁川星巖在詠中英雅片戰爭的詩裏即早已很生氣的說：

「赤縣神州殆一空，可憐無個半英雄；台灣流鬼無人島，切恐餘波及大東。」又如山內容堂亦對於英法聯軍攻陷北京，不覺失聲痛罵說：

「誰教醜虜入燕城？八百八街羶氣腥；開帙獨誦淡庵集，失聲欲罵小朝廷！」但中國的東亞第一大國的紙老虎還未曾給西洋人完全戮穿，而日安區區三島，得天獨薄，羽毛極大欠豐滿，所以大有聯絡中國之必要，故會澤泊在所著「新編」裏曾經說過這樣的話：「以今日形勢論，南海之島，東海之地，既爲各國所併，大地之勢，日朘月削，日本介居其間，譬猶孤城獨峙，勢將危殆。如土耳其者，尙能以舊日之聲勢，與東方爲犄角，而以餘力禁俄羅斯之東侵，莫臥兒亦戮力與土耳其爲爭波斯之地，凡此皆所以制俄羅斯之勢也。若夫未嘗沐回回教羅馬教化者，日本之外，惟有滿清，當今之日本求唇齒之邦於宇內，舍滿清殆無有也。」但滿清終是個「吳下阿蒙」，中毒過深，毫無奮發振作的氣象，所以在性急的日本人裏也有不以和清廷提攜聯絡爲然的，如島津齊彬即毫不客氣的說：

「不圖清國一弱至於如斯他！以彼地廣人衆，豈無忠臣義士？而鴉片戰爭

以後，政治仍然不整，內有長髮之擾，外被英法之侵，割地請和，天子蒙塵，謂非恥辱之大者耶？吾國（日本）介在東陲，誠不可不早爲之備。英法旣得志於新，勢將轉而向東，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以今日之形勢論，宜先出師，取清之一省，而置根據於亞東方陸之上。內以增日本之勢力，外以昭勇武於宇內，則英法雖強盛，或不敢干涉我矣。夫清國沿海諸地，關於日本國防者，惟福州爲最，取而代之，於國防有莫大之利益焉。況清人與日本人異，苟兵力足以制其民，則無不帖然從服。彼英法遠隔重洋，尙不憚用兵之勞以取之，况我日本乎？然吾之主張先取福州，非以清國之滅亡爲幸，實冀其早自覺悟，力圖整頓，與日本協力以禦英法也，然清國素以地廣人衆，傲慢自尊，視日本如屬邦，則是所謂協力禦侮者，亦終成夢想而已。故我之入手第一着，當以防外夷之攻略爲上策，或助明末之遺臣，先取台灣福州兩地，以去日本之外患……」

這樣看來，所謂清國的自身根本就沒有站得起來，日本怎會肯願意做朋友？如此，則所謂『大亞洲主義』者，豈不成爲捉風捕影，羌無事實根據之空談？

既有如上所述互相衝突矛盾的言論，於是我國神經過敏之徒便根本懷疑『大亞洲主義』原來就不能成立，並不待今日的險惡情勢而然，故中日兩國的關係實爲命定的勢不兩立，非火併到底，同歸於盡不可，故凡有提倡和平，調整中日國

際關係，以奠定百年大計的都不惜以極醜穢惡的臭頭銜加在他們身上，記得某氏所撰「論日製大亞洲主義」一文曾一方面痛詆日本的侵略主義者說：『日本雖在甲午之戰獲得勝利，但那時候就是最發狂的武夫亦不敢夢想征服東亞，因為他們還得解除由西伯利亞南侵的帝俄的威脅，到了一九〇五年日本得到對帝俄戰爭的勉強勝利以後，獨霸東亞的思想才開始萌芽，充爲現在日本軍事法西斯各種團體前身的玄洋社與黑龍會，那時候已有模糊的征服亞洲的意識。前者被視爲奉行大亞細亞主義的最初團體，後者在其綱領上標明：「吾人期望開拓肇國宏謀，闡明東方文化大道，進而求東西文明的調和，並方謀亞細亞民族的隆盛。」（原註：見木下平治著日本法西斯主義）前此歐洲大戰使日本在東方得到一個不受歐美諸國牽涉的發展勢力的機會，在煙種情形下，從前的模糊大亞細亞主義開始轉變爲內容比較明確與外形比較兇露的東方門羅主義。戰後，這種主義又暫時隱藏起來，其所以然者，第一，歐美列強在解除自己於那次戰爭苦危之後，又有力量重整東來的旗鼓，重申中國門戶開放主義；第二，日本資產羣在戰爭發了橫財，暫時表示滿足；第三，歐戰後歐美列強雖重返東方與日本競爭，但他們的競爭力在他們尙未完全恢復其於戰爭中損失的原氣以前，尙不甚大，相反的方面，因歐洲各國及其殖民地不能不致力於經濟復原，世界市場不能在某程度上，向日本開

放。這就使日本能夠以世界市場侵入之所得，抵償其在東方市場由列強再來競爭而惹起的損失，這也就使日本社會生產力暫時不爲督促的生產關係所窒息，在這種情形下，東方門羅主義的呼聲暫時沉寂下來。一九二九年日本資本主義的內部危機益加顯露；她的統治階級不能再由冒險戰爭中去覓得一條血路，一九一八事變與中國東北各省的佔據，使日本重新提起「大亞細亞主義」來。自蘆溝橋事變中日全面戰爭開始，到了武漢與廣州佔領，日本的軍力已發揮到它的頂點，同時也就是「大亞細亞主義」發揮到它頂點的時候。（中略）日本版的「大亞細亞主義」之爲更惡辣形式的東方門羅主義，證之以荒木貞夫告國民書中所云，益加無疑，他說：『歐洲只知道以歐洲爲天下，來解決世界上一切問題，與之對抗的美洲，在美洲門羅主義的旗幟下，由美洲處理美洲的一切事務，而不讓歐洲去過問，因此世界上都祇知歐洲和美洲，而不知道有亞洲。站在亞洲陣線前鋒的日本，要表明日本的使命，要使歐美與全世界人士認識，日本是雙肩挑起全部亞洲的』。叢爾的日本，爲甚麼要把那麼重的亞洲挑起自己的肩上？甚麼是日本的使命？荒木貞夫在同書他處指出：『今天皇國的日本正在那裏感悟着健統大精神。我們昭和時代的日本人的使命，就是把明治大正兩朝漸次興起的國民意氣伸張起來，把它與建國大道一同宣揚，使皇道內裏充實，外面大放光輝。』一言以蔽

之，「大亞細亞主義者」的使命無他，就是日本大精神與其文化的宣揚。……」一方面又解釋「孫中山先生所提倡的大亞洲主義並沒有得到日本一般人士的回音，其所以然者，日本資產羣雖然是黃色的，亞洲的，但與歐美白色資產羣一樣地是追求利潤的動物。亞洲諸弱大或弱小國度之保持其落後經濟狀態，就工業品必須依賴先進國輸入，因而不能不在不對等交換中，向先進國進獻大批財富這一點上看，不特於歐美白色資產羣，且於新興黃色日本資產羣有利。如果沒有廣大落後國的商品市場，先進國的利潤實現與資本積累就不可能，唯其如是，我們可說，亞洲諸民族——尤其中國——之不能跨入資本主義全發展的階段，正是日本資本主義特獨發展的一個最重要的物質條件。如果中國印度及其他東方國家，解放其自己於歐美資本主義先進國的桎梏，則在事態發展的邏輯上，他們亦必定解放自己於同顏色的資本主義日本的桎梏，這就縮滅了日本資產羣，所以可搾取的市場，斷喪了日本資本主義繼續發展的可能性，這就是所以使日本人士對於孫中山先生所提倡的「大亞洲主義」保持靜默的原因。如果中國印度能夠在日本資產羣的政治與經濟控制之下，來解除自己於歐美先進國的壓迫與剝削，則日本資產羣在這個場合可以獨佔東亞市場，這是日本資產羣所願意做的，唯其如是，日本有日本製的「大亞細亞洲主義」。……」這些話實在左傾得利害，大有共產黨徒的口氣意

味，但其中也有足令吾人注意的事，即最近在日本朝野「甚囂塵上」熱烈的討論所謂「東亞協同體」的呼聲裏，竟有杉原正己氏「明目張胆」，「毅然決然」的主張『在日本須把過去政治中所包含的自由主義及資本主義加以廢棄。』至於如荒木貞夫告國民書中所說「大亞細亞主義」的使命是在宣揚「日本的大精神與其文化，這在最富於「自高意識」的中國民族聽來，確亦很難於「心悅口服」的，因為那些關於日本的「大精神與其文化」的重大問題，還要留待專門研究日本歷史的學者們去重新估訂，或另下最後的結論，惟筆者現在很可以確信像荒木貞夫將軍那樣想以日本的「大精神與其文化」為中心來推行「大亞細亞主義」，其結果實在不祇不能折服中國，抑且不能感動安南暹羅，相跳質遠的印度，更不用說。故凡以「日本為中心的大亞細亞主義」，其趨勢非惟難以取得亞洲人民或世界人士的同情，甚或倒反引起猜疑，以為日本確是「包藏禍心」將要實現「掛羊頭，賣狗肉」的勾當，其影響所及，將要使那般「光明正大」如桂太郎公爵，小寺謙吉氏等等的「先覺」都要像『西子之蒙不潔，而人皆掩鼻過之』的一樣。

在別方面，小寺謙吉氏固然也曾說過這樣的一些話：『吾日本雖為內外事情之所制，自陷於帝國主義之渦中，而於中國問題，為維持東亞和平計，不能不拯之使免白哲人種之厄，則其欲為黃種之盟主勢也，夫如是可以護中國之領土使

全，可以使其民爲富強文化之民，可以同文同種，唇齒輔車之誼，與俱抗世界之大勢，可以建設亞細亞偉大之新文明，擴而充之，可以使黃種民族之棲息於亞細亞者，盡倚斯主義而享政治之自由，且可以統一黃種民族之在全世界者，凡此皆不可或無之理想焉。要而言之，則吾人所謂大亞細亞主義者，言以亞細亞之爲亞細亞入之亞細亞耳。……」

又說：『日本之所缺者，爲物的要素；中國之所缺者，爲武的要素；日本無中國，經濟不可獨立；中國無日本，政治不可以自存；誠欲有以備白哲人種，則此兩國黃色人種之相扶相助，長短相補，需給相倚，實勢之自然，兩國而欲全其獨立于國際之競爭，全其生存於人種之競爭，決不可無此，吾人之大亞細亞主義；蓋指是也。……』（參看「漢譯大亞細亞主義論」第九，十及四十七至四十九諸頁）這些話裏也有被解釋爲「以日本爲中心的大亞細亞主義」的可能，但他是「有世界眼光的人，所以他的和別的民族國家提攜的熱誠，遠勝過他的「生爲日本頭等大國民」的「優越感」，現在再引他的一段比較詳細明切的文字于下：

『第一，中國恃日本，受武力的掩護，日本依中國，受經濟的利益，而中國爲農業國，日本爲工業國，兩國關係日見親密，則雙方所受恩惠程度，亦日漸增加，自不待言，將來以人口衆多之中國陸軍，盡亞細亞之大陸的任務，以

海島帝國之日本海軍，當太平洋之海洋的任務，則極東平和始得確保，大亞細亞主義之理想亦得貫徹矣；是即於一定主義之下，聯結兩國之自然的要素，依人類進化之法則得享永久正當健全幸福之理由也。

第二於人種之爲同種族一點，較英美間其同族的關係尤爲純粹，何者？蓋中日兩國不論何方，不如美國之包含雜駁民族，皆純爲蒙古民族故耳。

第三，言語雖不相同，而文字則一也。

第四，對於文學，有共通的歷史，爲國民思想之要素，唯西洋文物輸入以來，日本人之文學趣味頗分歧錯雜，然其大概尙屬共通，至根本思想，猶不失其生命的，有兩國民性之連鎖勢力。

至第五政治的制度及第六之法律慣例並司法制度，則日本急激進步，中日兩國之地位，於斯點甚相懸殊，然從來日本制度法律及各種典例自古代冠位朝禮始，文武帝時代之大寶令以下，以至德川幕府時代之制度律令，悉由中國法制直譯或意譯，或斟酌參照而成，最近明治四年頒布之新律綱領，亦斟酌唐明清諸律而成。中日兩國民造歷史於同一文明之下，其由來久矣，而現中國復汲汲模倣日本制度法律以建設新文明，再俟若干歲月，此兩國制度法律當復入共通時代，其共通也，不僅拘於形式，將見與過去之歷史的涵養，同至精神的一致。

也必矣。

第七，蒙古民族非如歐美人對於宗教有固執心偏執心，固不待言，然中日兩國民於此點頗見共同一致，如日本佛教係由中國輸入者，且支配中國人道德之儒教，同爲日本人道德及格言之基礎。

第八，雜婚，因中國人視他國爲夷狄，及日本人長在銷國時代之遺習，其數尙未多，然祖先之血族關係，不僅爲兩國民感情永遠聯結之樞紐，且雜婚近亦有漸加之傾向。

第九之類似，卽遊戲娛樂演劇，及其他生活行動，尤見其一致，以邇近日常俗事徵之，在遊戲則角觥鬥鷄鞦韆傀儡之類，在娛樂則自圍棋象棋骨牌，以至管絃笙鼓等各種樂器，在生活行事則藏旦除夜人日端午重陽，以至冠婚葬祭之儀式，皆大同小異；在演劇則日本院本脚本中，由中國戲曲中翻譯而來者不少，斯等事例，實不遑枚舉，是兩國民有血族的關係，且日本文明久受中國文明影響之自然結果也。再就兩國關係，不可不附記者，其他理的位置，於海僅隔一葦水，於陸互接疆土；實有不可分離之事情是也。

卽英美聯合，較全美主義更爲自然的，中日結合較英美聯合更爲自然的，是卽大亞細亞主義之當面急務，所以主先圖中日兩國之結合，以之爲中心勢

力，而圖黃色人種之繁榮，以當歐美列強之世界的帝國主義，且足以備早晚實現之人種的大競爭也。……」（參看「漢譯大亞細亞主義論」第一七八至一八〇頁）

氏的親善的感情，真是「溢於言表」，惟所着眼尚僅限於中日兩國，這是因為他是一個「實際家」，所以要「按部就班」的「不事高論」，孫中山先生却是一位「豁達大度」的「理想家」，他講「大亞洲主義」，他的眼光就放射到亞洲的全部，他對亞洲所有的民族或國家，都彷彿是有「休戚相關」「已飢已溺」的深厚同情，這比小寺謙吉諸氏還來得「誠懇篤實」，「氣魄偉大」一點，如他所說：

「從日本戰勝俄國之日起，亞洲全部民族便想打破歐洲，便發生獨立的運動；所以埃及有獨立的運動，波斯土耳其有獨立的運動，阿富汗阿拉伯有獨立的運動，印度人也從此生出獨立的運動。……這種潮流在歐美人看得很清楚的，所以美國便有一位學者，曾做一本書，專討論有色人種的興趣，這本書的內容是說日本打取俄國，就是黃人打敗白人，將來這種潮流擴張之後，有色人種都可以聯絡起來和白人爲難，這便是白人的禍害，白人應該要思患預防。他後來更做了一本書，指斥一切民族解放之事業的運動，都是反叛文化的運動，

照他的主張，在歐洲的民族解放運動，固然是當作文化的反叛，至於亞洲的民族解放運動，更是應該當作反叛事業，這種思想在歐美一切特殊階級的人士都是相同的，所以他們用少數人既是壓制了本洲和本國多數人，更把那種流毒推廣到亞洲，來壓制我們九萬萬民族，要我們九萬萬的大多數，做他們少數人的奴隸，這真是非常的慘酷，真是可惡已極！而這位美國學者的論調，還以為亞洲民族有了覺悟，便是對於世界文化的反叛，由此便可見歐美人自視為傳授文化的正統，自以文化的主人翁自居，在歐洲人以外的，有了文化發生，有了獨立的思想，便視為反叛，所以用歐洲的文化和東洋的文化相比較，他們自然是以歐洲的文化，是合乎正義人道的文化，以亞洲的文化，是不合乎正義人道的文化。

專就最近幾百年的文化講，歐洲的物質文化極發達，我們東洋的這種文明不進步，從表面的觀瞻比較起來，歐洲自然好於亞洲，但是從根本上解剖起來，歐洲近百年是甚麼文化呢？是科學的文化，是注重功利的文化，這種文化應用到人類社會，只見物質文明，只有飛機炸彈，只有洋槍大砲，專是一種武力的文化，歐洲人近有專用這種武力的文化壓迫我們亞洲，所以我們亞洲便不能進步。這種專用武力壓迫人的文化，用我們中國的古話說，就是行霸道，所

以歐洲的文化是霸道的文化，但是我們東洋向來輕視霸文化道的。還有一種文化好過霸道的文化，這種文化的本質是仁義道德，用這種仁義道德的文化，是感化人，不是壓迫人，是要人懷德，不是要人畏威，這種要人懷德的文化，我們中國的古話就說是行王道，所以亞洲的文化就是王道的文化。自歐洲的物質文明發達，霸道大行之後，世界各國的道德，便天天退步，就是亞洲，也有好幾個國家的道德也是很退步。近來歐美學者稍爲留心東洋文化，也漸漸知道東洋的物質文明，雖然不如西方，但是東洋的道德，便比西方高得多。

用霸道的文化和王道的文化比較起來說，究竟是那一種有益於正義和人道？那一種是有利於民族和國家？諸君可以自己證明，我也可以舉一個例子來說明，譬如從五百年以前以至兩千年以前，當中有一千多年，中國在世界上是頂強的國家，國家的地位好像現在的英國美國一樣，英國美國現在的強盛是列強，中國從前的強盛是獨強，中國當獨強的時候，對於各弱小民族和各弱小國家是怎麼樣呢？當時各弱小民族和各弱小國家，對於中國又是怎麼樣呢？當時各弱小民族和國家都是拜中國爲上邦，要到中國來朝貢，要中國收他們爲藩屬，以能夠到中國來朝貢的爲榮耀，不能到中國朝貢的是恥辱。當時來朝貢中國的，不但是亞洲各國，就是歐洲西方各國，也有不怕遠路而來的。中國從前

能夠要那樣多的國家和那樣遠的民族來朝貢，是用甚麼方法呢？是不是用海陸軍的霸道，強迫他們來朝貢呢？不是的，中國完全是用王道感化他們，他們是懷中國的德，甘心情願，自己來朝貢的，他們一受了中國王道的感化，不只是到中國來朝貢一次，並且子子孫孫都要到中國來朝貢，這種事實，到最近還有證據，譬如在印度的北方，有兩個小國，一個叫做布丹，一個叫做尼泊爾，那兩個國家雖然是小，但是民族很強盛，又很強悍，勇敢善戰；尼泊爾的民族叫做廓爾喀，尤其是勇敢善戰，現在英國治理印度，常常到尼泊爾去招廓爾喀人當兵來壓服印度，英國能夠滅掉很大的印度，把印度做殖民地，但是不敢輕視尼泊爾，每年還要津貼尼泊爾許多錢，才能派一個考察政治的駐紮官，像英國是現在世界上頂強的國家，尚且是這樣恭敬尼泊爾，可見尼泊爾是亞洲的一個強國，尼泊爾這個強國對於英國是怎麼呢？英國強了一百多年，英國滅印度也要到一百多年，尼泊爾和英國的殖民地，密邇連接有這樣的久，不但是不到英國去朝貢，反要受英國的津貼。至於尼泊爾對於中國是怎麼樣呢？中國的國家地位現在一落千丈，還趕不上英國一個殖民地，離尼泊爾又極遠，當中還要隔個很大的西藏，尼泊爾至今還是拜中國爲上邦，在民國元年還走西藏到中國來朝貢，後來走到四川邊境，因爲交通不方便，所以沒有再來。就尼泊爾對於中

國和英國的區別，諸君看是奇怪不奇怪呢？更拿尼泊爾民族對於中國和英國的態度說，便可以比較中國的東方文明和英國的西方化明，中國國勢雖然是衰了幾百年，但是文化尙存，尼泊爾還要視爲上邦，英國現在雖然是很強盛，有很好的物質的明文，但是尼泊爾不理會，由此便可知尼泊爾是受了中國的感化，尼泊爾視中國的文化才是真文化，視英國的物質文化，不當作文化，只當作霸道。

我們現在講大亞洲主義，研究到這個地步，究竟是甚麼問題呢？簡而言之，就是文化問題，就是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比較和衝突問題，東方的文化是王道，西方的文化是霸道，講王道是主張仁義道德，講霸道是主張功利強權；講仁義道德，是由正義公理來感化人；講功利強權，是用洋槍大砲來壓迫人。受了感化的人，就是上國衰了幾百年，還是不能忘記，還是像尼泊爾至今仍是心甘情愿要拜中國爲上邦。受了壓迫的人，就是上國當時很強盛，還是時時想脫離，像英國征服了埃及，滅了印度，就是英國極強盛，埃及印度還是時時刻刻要脫離英國，時時刻刻獨立的運動。……」（見「孫中山全集」第四輯第二二八至二二三頁）

這是孫中山先生以「東方文化」的立場來詮釋「大亞洲主義」的涵義，並確

定其範圍，比起荒木貞夫將軍等所主張的「宣揚日本大精神及其文化」的固然不可同日而語，就是如中野正剛氏所說的「以日本爲中心的大亞細亞主義」，在態度上也有寬大與窄狹的差別，我們若把眼光放得長遠一點，將來不只是要使整個亞細亞洲得到永久的和平與繁榮，而且希望全世界都能達到「大同」的理想，那麼我們中日兩國的人民對於孫中山先生所提倡的『大亞洲主義』，是應該擁護到底，絲毫用不着懷疑的。

大亞洲主義之精神

周 匡

大亞洲主義是主張根據東方之仁義道德的文化基礎，王道精神，聯合亞洲各國各民族的一個共同的平等的組織。這種國家的聯合和大英帝國的結合正相反，和大斯拉夫主義，大日爾曼主義所主張的不同，和國際聯盟也異其趣，和拉丁美洲門羅主義到有些相同。

大英帝國是由坎大拿，澳大利亞，新西蘭，愛爾蘭自由邦，印度，等等國家所組成，這些國家根本不是自由結合的，乃是英格蘭以武力強權造成的，這些國家是不平等的，英國是統制者，這些國家是被統制者，這和大亞洲主義者所主張的各國家由於仁義道德的王道，平等的結合恰恰相反。大斯拉夫主義和大日爾曼主義，雖則他們是以同文同種作出發點，但是大斯拉夫主義者是主張以俄國武力強權控制所有其他斯拉夫民族國家的，大日爾曼主義者是主張以德國的武力強權來控制所有日爾曼民族的國家的，其中俄國德國都是企圖居於控制甚或統制的地位，各同種國家間仍不平等，這是與大亞洲主義者所主張平等的結合有顯著的差別的。國際聯盟呢，雖則表面上是會員國平等，但實在祇受幾個大國操縱，國際

的行動也是祇謀大國的利益，不顧小國的犧牲，至少也不是平等的，而是小國聽大國指揮的。

固然，我們不能不承認在國家的結合中有些國家在某些部門具有領導者的資格。但這是互助合作的，譬如說日本的武功文化在亞洲各國中最進步，科學技術最發達，中國在開發天然富源發達實業需要日本的技術和資本的幫助。從而雙方可以獲利，這是共存共榮，是平等互惠，並非以一國作他一國的犧牲的。所以平等互惠的精神才是所謂大亞洲主義組成的紐帶。至於拉丁美洲和美洲門羅主義聯合所有美洲的國家，在獨立平等的原則下結合，共同反對歐洲人在美洲找殖民地，防禦歐洲人對美洲的侵略，就這些觀點看，這是和大亞洲主義相同的。不過大亞洲主義除此之外尚有牠獨具之特性，如 總理所說：

「我們現在講大亞洲主義，研究到這個地步究竟是什麼問題呢？簡而言之，就是文化問題，就是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比較和衝突問題，東方的文化是王道，西方的文化是霸道，講王道是主張仁義道德，講霸道是主張功利強權；講仁義道德，是由正義公理來感化人，講霸道是用洋槍大砲來壓迫人；……」（對神戶商業會議所等五團體演講詞）

接着總理還舉出許多例證證明以強權來壓迫人必然失敗，以東方精神之道德

感化人才是可以持久的辦法。這種以東方文化和王道精神爲基礎的大亞洲主義，便是從以霸道和功利相結合的西方任何種組織區別出來的鴻溝。

綜上所述，大亞洲主義之本質乃益明瞭。這樣的大亞洲主義在亞洲民族艱苦奮鬥的過程中，是能體念出牠的急切需要的。譬如日本在幾十年前曾經受歐美人之壓迫，什麼不平等條約，領事裁判權等等，其所受的痛苦不亞於中國，因爲日本人自己努力上進擺脫了這些羈伴給黃種人增光不少，但現在，日本曾受的痛苦，其他亞洲國家現仍在忍受之中，在其他國家自己努力反抗這種壓迫時，日本以一亞洲先進國之立場應予以便利，并應在（一）必須根據東方仁義道德文化（二）必須各國家平等的這兩個原則之下更進而聯合亞洲所有的國家共同奮鬥，大亞洲主義才可以合理的實現。

大亞洲主義與遠東門羅主義

子遺

我們每一提起『遠東門羅主義』這個名詞，就彷彿很有些像『大亞洲主義』，所以有些人非常痛恨所謂『遠東門羅主義』就不分清紅皂白，對純潔無疵的『大亞洲主義』也竟懷起疑來，以為這也不過是一個掛羊頭賣狗肉的東西，須小心提防吃虧上當，其實那般把『遠東門羅主義』與『大亞洲主義』混為一談的人，只不過就字面粗粗的隨便加以觀察，便大逞臆說，他們從來不曾覺悟『似是而非！』我也不是一个頂喜歡打筆墨官司的人，不過爲了擁護真理，我也不嫌詞費，再來下一番剖析的研究工夫，想來也是我們信仰『大亞洲主義』的同志諸公所樂於聽聞的罷。

關於『遠東門羅主義』的思想的起源與發展，有的人以爲是在日俄戰爭結束之後，如：

一、布拉克斯里氏 George H. Blakeslee 所作「日本的門羅主義」一文有說：「……關於亞洲的門羅主義思想，在日本還是在一九零四五年（光緒三十至三十一年）日俄之戰以後短時期內所發生的，至日本政府進行侵略的外交政策

時期而再加強。自世界大戰起，日本驅逐德國於中國與北太平洋之外的成功，門羅主義乃更趨於具體化。隨後，尤其在華盛頓會議以後，有幾年是日本對中國取『親善政策』的時期，在這時期，『日本門羅主義』的聲浪比較趨於沉寂，但自從最近尖銳化的中日紛爭以來這思想又突然興起而且加強了。』又說：這『日本門羅主義』日本政府已經正式公布。「維持遠東和平與秩序是日本的責任，」那是在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二月廿一日開幕之國聯會議裏日本代表團在它報告中之說明；外相內田康哉伯爵在一月廿一日帝國議會裏的演說，也指出國聯盟約二十一條——該條原文承認在特定區域之諒解的意義下，門羅主義之有效——而說：『國聯盟約很廣泛的準備着，凡特定區域之諒解是應被尊重的，所以在這意義上，我們政府深信，對於建立遠東和平之基礎的任何計劃，是必需的建築在承認日本之既成勢力這一條件上的，因為日本的既成勢力是世界的這一部分上的和平砥柱。』雖然，這種語氣是含糊的外交的術語，但日本政府宣布在遠東門羅主義的權利之意志是已異常明瞭了。當石井菊次郎於一九一七年（民國六年）在華盛頓做大使時，也曾經說過亞洲的門羅主義，而且還叩問過美國的國務卿藍辛 Lansing，要求承認日本在中國有『優先權利。』在他最近出版的『外交餘錄』書裏，這位

志高氣昂的日本政治家寫着這樣：『從我們的立場來說，日本在全中國，占有着較任何列強要優越的利益，而尤以比鄰之境爲然，這種情形正如你們美國人之於西半球，也尤像你們美國人之於墨西哥與中美諸國。』……』（本文見 *Foreign Affairs*, Vol. 11, No. 4, July 1933）

二、婁壯行氏所著『國際現勢與中國地位』一書也有說：

『「東亞門羅主義」這名字是根據美洲門羅主義而來的。……日俄戰爭後，日本第一次提出「東亞門羅主義」的口號，到了近年更到處引用；一九三四年（民國二十三年）的「四一七」聲明，更被認爲「東亞門羅主義」的流露。……』（參看本書第六章第二節第一〇七，八兩頁）

又有的人以爲是在民國三年以後，如：

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教授橫田喜三郎博士所著『亞洲門羅主義之批評』一文有說：

『自滿洲事件發生，日本輿論界主張亞洲門羅主義之聲浪立起。及至脫退國際聯盟漸趨於決定，於是所謂今後外交之指導原則，應爲亞洲門羅主義之主張亦漸趨於強烈，今日適其盛時也。惟亞洲門羅主義之主張，非必自今日始也，溯諸往昔，曾屢見不鮮。特於大正三年至七年（民國三年至七年）世界

大戰之時爲最盛，著名二十一條問題即發生在大正四年（民國四年），此時爲達於最高潮之時期，故今日之主張，實不過爲舊調重彈而已。』又說：『日本立國於亞細亞，較之美歐諸國之在亞洲，又特於鄰國之中國，應有其特殊權益，…世界大戰時所主張有亞洲門羅主義，其大體內容即係如是，大正四年對中國有名之二十一條要求問題即根據於此，欲在中國各地特與日本相鄰接滿洲東部及內蒙古，應獲得優先的權利與利益。大正六年（民國六年）當石井蘭辛協定交涉之時，石井大使竭力周旋欲使美國承認日本在中國之特殊利益，亦復因是。其後大正十四年（民國十四年）與昭和三年（民國十七年）計有二次，日本在滿洲實行兵力的干涉，此即爲保護此特殊權益而主張其特別之干涉權者也。…』（見昭和八年—民國二十二年—『中央公論』七月號）

按以上兩說，仍以『遠東門羅主義』發生於民國二年以後較爲有事實上的根據，這就是因爲世界大戰爆發，歐美各國自顧不暇，無力過問遠東事件，故『遠東門羅主義』纔自然而然的產生了出來。

所謂『門羅主義』 Monroe Doctrine 本是指美到大總統門羅氏 James Monroe (b. 1759. d. 1831) 在一八一三年（道光三年）十二月二日所給國會的報告書的內

容而言，此事的經過情形，敘述得比較詳細一點的，如萊丹氏 J. H. Latane 所作『美國外交政策史』A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第八章『門羅總統的宣言』，（參看王造時氏漢譯本第二四五至二八一頁）惟頭緒稍嫌過繁，現引倪爾林 Scott Nearing 弗里門 Joseph Freeman 兩氏合著的『美帝國的金元外交』Dollar Diplomacy 的幾段以資說明如下：『在南美洲的西班牙各殖民地，乘着歐洲方面正爲拿破崙戰後擾攘不定的時候，紛紛起而獨立，自號爲民主國。那時美國總統門羅，立意承認南美殖民地爲獨立國，一八二二年（道光二年）五月，因門羅之請求，美國國會就專爲此事投票解決，指撥款項以使美國的承認能確實有效。一八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歐洲奧俄普三國神聖同盟會議於維洛拉 Verona 簽訂一項祕密條約：『共同撲滅歐洲各國的代議政府制度，一面竭力預防其傳入未採用此項制度的國家。』自從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發明軋棉機以後，在美國的南部，棉花已占重要位置；新的棉花園地的獲得，繼續要求不已；南方蓄奴諸省，在聯邦政府內原占有大勢力；正在尋找與牠們同道的蓄奴省分，以抵制西北方與未艾的自由省分，而且牠們的勢力業有進迫佛羅里達和退克薩斯 Texas，并存心獲得古巴。歐洲的神聖同盟如果得勢，自與這種企圖爲大不利。英國方面，對於神聖同盟替西班牙恢復拉丁亞美利加殖民地的詭計，表示反對。英國內閣

總理坎甯 Gannett 的美國提議，由英美兩國聯名發一宣言，贊助南美各民主國的獨立。此次英國何以決然放棄她的法律正統主義呢？其原因就是她與拉丁亞美利加的商業關係，增加很廣，該地假若再屬於西班牙，她即不免再受損害。……美國方面反對與英國發表聯合宣言的最力的亞丹斯 John Quincy Adams 是那門羅總統的內閣的國務卿。他辯駁道：『坎甯的目的，似乎是實際的，或特別的，反對美國自己對於西班牙的美洲屬地的任何部分的獲得。……我們若與英國聯合發表宣言，那麼，我們即給予她一個反對我們自己行動的具體而有妨礙的誓約，而實際上無報酬可得。……』因此，他不贊成與英國聯合，而主張由美國發一單獨的不同的宣言。這個時期的形勢，因俄國方面的要求而更增紛擾。俄國政府要把他在美洲的領土展至北緯五十一度的地方；同時俄國商人也有一項計劃，要在現在加利佛尼亞的地方，建築一個商港。一八二三年（道光三年）七月亞丹斯通告俄國大使說：『特別重要的，我們反對俄國在此大陸上取得新領土的權利。我們請明白的申述我們的原則：就是美洲不能再讓歐洲國家在此建立新殖民地了。』這種觀念包含在一八二三年十二月二日門羅總統送給國會的公文內，這項公文定下了美國對外重要原則，即後來所通稱爲門羅主義者。門羅主義公文內，重申美國不與外國締結同盟的主張，宣稱歐洲與美洲之間是不相同而且不相合的；公文側重的

事實是：歐洲的政治制度，不許擴張到西半球來；最後，牠更大略宣言說，殖民的時代，業已告一段落了。

『我們對歐洲的政策，原來在早一個時期，歐洲正耽於戰爭的時候，便已採用了的；直到於今還是不變。這種政策就是，我們不管他們任何一國的內政如何，隨時承認其事實政府爲合法政府，做我們交涉的對手。但是關於美洲：情形就顯然的完全兩樣。歐洲列強若是擴張他們的政治勢力到這邊來，就不能無危害於我們的和平及快樂。就是讓我們南美諸友國自由選擇，也決不會樂意接受他們的。……時機已經成熟，我們就要確切的宣布這個原則，我們美國的權利和利益也包括在這原則內面，就是：美洲（南北美）已經取得並且保持了自由而獨立的地位，牠們從此不能容許歐洲列強再行來此殖民了。』……（參看原書第三編第九章及柳克述陳漢平兩氏合譯本第二百八十六至二百八十九頁）

我們從這篇「門羅主義的原文」可以大概確定其扼要之點如下：

甲、反對歐洲諸國以美洲大陸爲將來殖民的對象；

乙、反對歐洲於美洲大陸延長其政治組織，特別是反對對於那些既已獨立的政府還要加以壓迫干涉；惟美國更聲明對於歐洲現在所有的殖民地或屬

地也並不有干涉的舉動；

丙、對於歐洲諸國的內政，美國亦不過問。

這個『門羅主義』經過一百多年，到了一九二三年（民國十二年）美國國務卿許士氏 Charles Evans Hughes 又會重加解釋，大意謂此主義的本質從最初的聲明以來並無多大的變化，現在僅將其細目修正為兩點，即第一，此主義最初係對歐洲諸國而發，今則擴充到凡美洲大陸以外一切國家都可以適用；第二，此主義根本反對其他大陸國家於美洲大陸為新領土的支配，無論其支配的方法是怎麼樣，此主義均得而適用之。所謂『門羅主義』的內容我們既已明瞭，現在我們就進一步來看看所謂『遠東門羅主義』與其相同或歧異之點，及所謂『大亞洲主義』者自有其不可隨便混亂的特點之所在的地方。

根據上面所探討研究的結果，我們實在沒有絲毫疑惑可以來下最後的判斷說：所謂『遠東門羅主義』就是自『美洲門羅主義』的思想脫胎而出，故荒木貞夫將軍在他的『告國民書』裏面赤裸裸的說過如下的一段話：

『……歐洲只知道以歐洲為天下，來解決世界上一切問題，與之對抗的美洲，在美洲門羅主義的旗幟下，由美洲處理美洲的一切事務，而不讓歐洲去過問，因此世界上都祇知歐洲和美洲，而不知道有亞洲。站在亞洲陣線前鋒

的日本，要表明日本的使命，要使歐美與全世界人士認識，日本是雙肩挑起全部亞洲的。」

又說：

「今天皇國的日本正在那裏感悟着傳統大精神。我們昭和時代的日本人的使命，就是把明治大正兩朝漸次興起的國民意氣伸張起來，把它與建國大道一同宣揚，使皇道內裏充實，外面大放光輝。」

此外如橋本增吉氏所作『民族自信之強化與外交之刷新』一文也有說：

『將來之外交方策，亦即據其『根本』，予以澈底之刷新；所謂根本者，亦即以亞細亞爲中心。換言之，卽一掃從來追隨歐洲之維新以來之外交基調。而以亞細亞民族爲主體。特於與此等具有密切關係之歐美列國交涉之時，尤必須喚起其特殊之注意。惟此處苟以具體之事實，公然言之，以爲或無益而有害，要之，中歐之風雲日急，吾人能於此時脫退國際聯盟，眞可謂捉得最好之時期，此不容吾人不喜，不容吾人不爲我吾族之前途祝福也。』

（見『外交時報』第六十六卷第一號）

這是『遠東門羅主義』的一個含蓄的解釋，所以最露骨最具體完全的還是要推那一篇爲全世界人士如雷灌耳的有名的『天羽聲明』，此文卽係昭和九年（民

國二十三年）四月十七日日本外務省的發言人天羽英二氏，所發表的聲明，其全文如下：

「關於中國問題，日本之立場與主張，或有不與列國一致者，唯日本爲盡在東亞之使命與責任，實立於不能不盡其全力之立場。曩時日本之所以不能不退出國聯，實因日本對於自國在東亞地位之見解，與國聯相左有以致之。日本對於中國之態度，我有與外國未能一致者，亦未可知；唯此種情形，乃導源於日本在東亞之地位與使命而不得不然。日本對於各外國，常維持增進交好關係，自不待論，而日本爲維持東亞之和平及秩序，以單獨責任進行之事實，日本亦認爲係當然之歸結。又單獨進行維持東亞之和平與秩序，乃日本之使命，日本對此使命，有決行之決心。唯欲使右述使命得以進行，日本又不能不與中國共分維持東亞和平之責任，中國以外國家，固非分擔責任也。職是之故，中國之保全，統一，乃至國內秩序之恢復，自東亞和平見地觀察，固日本最所切望者。唯中國之保全，統一，及秩序恢復，必有待於中國自身之自覺與努力，已爲過去歷史所昭示，此種情形，現在爲然，卽將來亦莫不爲然。帝國自此種見地出發，認中國方面苟有利用他國，排斥日本，出之以違反東亞和平一類手段，或出之以以夷制夷之對外方策日本不得已，

決不能不與以排擊，又列國方面，苟因顧慮滿洲事變，上海事變形成之情勢而對中國欲將共同動作，則縱令其名目爲財政的援助或技術的援助，終局在中國，必然的帶政治意味。此種情勢助長之時，遂開設定勢力範圍，國際管理或瓜分之端，此不僅對中國爲大不幸，即東亞之保全，乃至爲日本計，亦有影響重大之懼。日本在主義上，不能不對此表示反對。唯各國各別與中國自經濟上貿易上進行交涉，事實上雖爲對華援助，但在不妨害東亞和平維持範圍以內，日本亦無對此實行干涉之必要；如右述措置，誠使東亞和平維持陷於紛亂，例如最近外國對華售賣軍用飛機，教授飛行術，派遣軍事教育顧問，軍事顧問等，或借政治借款，結局明白離間中國與日本及與其他各國間之關係，發生違反東亞和平維持之結果，日本就其立場言，不得不反對。

『上述方針，雖爲日本從來方針之當然的演譯，然因最近外國在中國國內，共同動作，以援助一類之種種名目，積極的策動，此時明我立場，決非徒爾也云云』。

有人說日本人是環球人類中最善於模倣的，別的事物我不知道，只拿這篇『天羽聲明』的文字的本身來看，比較那篇『美洲的門羅主義』確實是『後來居上！』大有『青出於藍而青於藍，冰生於水而寒於水』的樣子。

一般西洋人對於『遠東門羅主義』這個名詞常常看得不大順眼，——或許簡直可以說是『惡心』『刺目』！他們每一開口，就不禁大肆譏諷嘲罵，如那位羅天樂氏 G. Lantenschlager 在他的那篇『中日戰爭展望』的一篇講演辭裏即有云：

『……日本對美國說：『日本侵略中國，係欲在亞洲建立門羅主義，這種門羅主義即與美國在南美洲的門羅主義同其性質。』美國的當局聽到這句話之後，不由得無名火起，回答說：『美國的門羅主義是保持南美洲的獨立，但美國對南美洲並無破壞及侵略的行爲。』……』（見民國二十八年二月十一日『香港大公報』第四版）

布拉克斯里氏所作『日本之門羅主義』一文也曾說過：

『……在事實上，日本門羅主義與美國門羅主義之間是僅僅有一點無關緊要相同之點。美國的門羅主義，依照已經公開的定義是唯一的自衛政策，它是所以限制反對美國之任何別的國家在這半球上佔取領土與政治統制之壓迫的。它也並沒有主張『特殊權利』，『霸道』或『經濟特權』。然而日本的門羅主義，可就不是如此，果然，它也包含着同樣自衛的意義，也承認要反對非亞洲人之領土的或政治的侵佔，但這在日本門羅主義是僅僅極小的一部分。』

當日本人在提起美國門羅主義的時候，日本人內心上便深印着美國之加里比安海的政策 *Caribbean Policy*，這是實在的。他們的參考是一切美國與墨西哥、古巴、巴拿馬與尼加拉瓜 *Nicaragua* 之關係。這加里比安海的政策，在一九一三年（民國十二年）國務卿許士 *Hughes* 纔第一次從門羅主義裏提出公開的異義；但是從美國歷史的開端，美國人民都覺得美國之在『拉丁美利堅』，較諸較遠地位其他的地方是有着更大的利益與更大的責任的。

在日本門羅主義與美國加里比安海政策之間，有相似之點，但也有不同之點。在日本與滿洲以至中國的關係上，與美國對於墨西哥以至加里比安海中諸國之一的形勢，確實有相似之處，美國與日本都是強國，而面對着那些政治組織既不健全，軍事實力又不強固的國家，而且他們還常常爲內戰所四分五裂。美日兩國都是資本主義的與工業化的國家，而跟他們對比着的鄰國却還逗留在原始的農業領域裏。美日兩國又都有高度的行政與組織能力；同時又都有國家的利益以及認爲生命線之軍略的與商業的利益（如美國之於巴拿馬運河，日本之於南滿鐵道。而且都有很大的投資；美國投資於墨西哥與加里比安中諸國（委內章納 *Venezuela* 或哥倫比亞除外）的資金幾達三，二九三，〇〇〇，〇〇〇美金元，而日本之於滿洲也在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美金元與一，○○○，○○○，○○○美金元之間。

從這些事實上看來，美日兩國所發展的政策在某幾點上是相同，兩國都是要阻止在他們有特殊利益的區域裏，有別國的侵佔與統制。兩國也都公布在維持和平與秩序上，兩國都有其最小限度的責任——雖然這一種責任，各國在美國的場合是承認的，而於日本則否！兩國之目的都是對於他們的利益，以及他們的國民與財產予以正當的與必需的保護。而且兩國又都隨時應用軍事的力量來實行他們的政策。……

雖然，在美國與日本之尊重地位，政策與行動之間，自有其相似之點，但也還是有顯著的不同。嚴格的說，日本在亞洲之地位是還不足以與美國之在美洲相提並論，因為美國是擁有龐大的土地與稠密的人口，對比着一打加里比安海諸共和國，他們却祇有極小的面積與人口；但另一方面之日本則不然，她自己僅有很小面積的土地與人口，而對比着中國却有廣漠的土地與人口的。所以這就顯示出美國向加里比安海各國推進之自然，而日本的情形却並不如此。

而且關於政治的意義之包含在日本門羅主義裏面的，最重要的幾點，都是與美國政策不相符合。這幾點即是所謂『生存權利，生命線與經濟的擴張

『都是獨一無二的日本人的。美國不需要運用武力來誘導加里比安海諸國允許美國資本爲有利事業之投資。加里比安海諸國之門戶自動的很廣大的開放着。美國也沒有在何拉丁美利堅共和國企圖占有或尋覓一個排外的經濟互惠條約；更沒有企圖把鐵道、外藉投資或一切物質的財源必得保留給美國公民。也從沒有違反任何拉丁美利堅國家的意志，而要求他們務必開放其天然的財源。在美國各報上，也沒有發現過經常的論評，是主張把加里比安海諸國的現狀務必改變而形成美國之經濟的與政治的特殊權益。……』

把美國在加里比安海的政策與日本門羅主義對比時，項主要的，便是去考慮兩者之間的本質的目的。從這一個考察的結果，顯然的，他們是根本的不同。雖然美國在加里比安海諸國的行動，不是每一件都可以完全證實，但其政策的真面目——尤其近年來是很明顯的。加之保護美國人之生命與財產之一般的責任，其目的也祇在於協助落後的加里比安海諸國去建立與維持穩固與繁榮之條件而已。美國並沒有企圖直接的或非直接的把握加里比安海諸國的任何領土，或是僭取他們的政治的或經濟的統治。當其感覺到對於『沒收土地』等場合有進行干涉之必要時，美國是會努力於必要的改組的，但當事件已解決或完畢時，即又撤退其軍隊了。像這樣的情形，無論在墨西哥，在

古巴，在尼加拉瓜，在海地以及多米尼亞共和國，美國在她自己的歷史上都常常是這樣的報告着。總而言之，美國的政策是在於維持加里比安海諸國的現狀，而日本呢？竟恰恰相反。……』（見 *Foreign Affairs*, Vol. II, No 4, July, 1933）

以上所引這兩篇文章，也許還是出於「親華反日」——「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外國人之手，所以不免故意歪曲事實，但最令人驚異不置的，即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的法學部教授橫田喜三郎博士所撰「亞洲門羅主義之批評」一文也在彷彿「大公無我」的與羅天樂氏布拉克斯里氏成爲同調，所以竟能言一般日本人不能言或不敢言者，如云：

『第一，亞洲門羅主義謂日本在亞洲得主張有特殊之利益。於亞洲之內又特於鄰國中國，日本主張有特殊之權益，得加以特殊之干涉，以此而與美國門羅主義相對照，不能謂爲此乃正當之主張毫無疑義存在，蓋勢有不然，美國門羅主義者，其內容並不若是，誠以門羅主義因美國於美洲大陸，有特殊之利害關係，故有特殊之注意而爲此主張，不能如對於歐洲大陸之不關痛癢。但其外部又特爲對於歐洲干涉美洲諸國之內政，壓制其獨立，或獲得新政治的支配權時，則不能不爲關心，若有此種企圖必爲反對之，其主張如是

而已，決非爲美國自身要求優先的特別之權利與利益，爲其保障，而主張一般所否認之特別干涉之權利。此項於大正六年（民國六年）之石井蘭辛協定交涉時，爲美國國務卿藍辛明白指摘之點。石井大使則對於中國又特以對於滿洲主張日本有特殊權益，因對此呼之爲亞細亞門羅主義而蘭辛則謂門羅主義，決非爲美國在美洲大陸要求有特殊權益，僅於非美洲諸國在美洲大陸有所干涉，加以排斥，是則應爲注意之點。要之，門羅主義並未含有於美洲大陸美國主張其特殊利益，即非要求特殊之權益，與主張特別之干涉權也。因而所謂亞洲門羅主義，於亞洲日本亦即不得主張有特殊之權益，是故要求特殊之權益，與主張特別之干涉權誠爲不當，實不得不謂爲無所根據，故所謂亞洲門羅主義若準之於門羅主義，則實應如斯也。

或以爲美國對於加勒比亞地方屢爲行使干涉即係由此而發生，爲此說者，蓋不甚瞭解彼處之實情也。實則美國對此等地方固曾加以調停，助力，對革命政府不承認，甚至於爲行政之監督，一時的軍事占領等，因此一般人對於此等行動即思爲由門羅主義而發生。但於此須爲下列兩點之注意：（一）右之行動實非門羅主義，乃爲相異之加勒比亞政策，兩者應爲加以區別，許士氏又特爲注意此點，已爲多數人公認之事實。（二）所謂加勒比亞政策

云者，雖可主張特殊之干涉權，然不必即從而可以要求特殊之權益。是故日本於亞洲若主張要求其特殊之權益，此乃將門羅主義與加勒比亞政策相混同，實則在門羅主義之下即不得作如是主張，若在加勒比亞政策之下更不得如是主張，此種主張誠可謂爲兩重之錯誤。或又以爲加勒比亞政策特殊之干涉權係自美國創行之，因而謂日本行之當無所阻礙，殊不知對於加勒比亞政策，又特別對於行政的監督與軍事的占領，惹起加勒比亞諸國非常的反感與反抗，其他諸國羣爲非難，即在美國本國中反對者亦夥。因而一般人俱以此政策爲不當，乃大招反對之政策，而日本之採用此種政策，或更有超乎此點以上者，決難認爲正當，定受强大非難，因此而即爲亞洲門羅主義之主張，更屬全無根據矣。

第二，亞洲門羅主義主張關於亞洲之問題與紛爭，排斥歐美之干涉，亞洲之問題與紛爭應由亞洲諸國自爲解決，在歐美諸國不得干涉之。日本之門羅主義，此可爲正當之主張耶？兩者之間，甚相類似乃無疑義，門羅主義自發生至今日排斥一切非美洲國家對於美洲大陸之干涉，因而在排斥其他大陸干涉之點，兩者固相類似，甚或可謂同一者也。但同時亦有其重要之差異點在。門羅主義云者，若依門羅主義總統之咨文則爲：凡「歐洲諸國延長其政

治組織於美洲大陸時」，爲「對於既已宣言維持獨立之政府加之以壓迫」，若從許士氏之解釋則凡「侵害美洲大陸國家政治的獨立」，爲「對於美洲大陸爲新領土之占領」，行使此種干涉俱爲排斥之。一言以蔽之，凡侵害美洲諸國之獨立，在美洲大陸獲取新領土者此種干涉應行排斥之，其他之干涉則否，故所謂門羅主義者如是而已。反觀亞洲門羅主義，則凡對於亞洲之問題與紛爭俱在排斥之列，不僅限於亞洲諸國獨立之侵害，與夫於亞洲大陸獲得新領土之干涉已也，因之行使干涉之目的與其事實，門羅主義與亞洲門羅主義之間殊有重要之差別，後者較前者之範圍殊爲廣闊，同時此廣闊之限界，不得不謂爲毫無根據。亞洲門羅主義之主張，原準於門羅主義而來，是後者之範圍當然不能主張較爲廣大之範圍，今爲如此廣大範圍並無根據，殊屬不當之至焉。

關於此點，所特應注意者，爲紛爭之和平的解決問題。於亞洲二國之間發生紛爭之時，以主張亞洲門羅主義爲理由而可以排斥歐美之參與乎？美、國門羅主義所排斥之行爲，顯非包含爲和平解決之參與，蓋既不侵害美洲諸國之獨立，亦不欲在美洲大陸獲得新領土，其目的則在保障其獨立，防止其領土之被侵害也。誠若其紛爭無和平的解決，必訴之於戰爭，或行使其他兵

力之情形時，則其獨立得被侵害，領土得被侵略焉。故在其實際之情形，美國對於紛爭和平解決之參與並不反對，而其他美洲國家並進而將其紛爭委託於歐人之仲裁法庭者又數見不鮮。故一般對於美洲諸國間紛爭之和平解決之參與，與門羅主義或其他之美國外交政策認為並不相反。由此觀之，關於紛爭和平解決之問題，乃顯為門羅主義範圍以外之問題，故在亞洲門羅主義，亦不得不如此相同者也。……

第三，亞洲門羅主義主張在歐美支配下之亞洲領土應為解放之，並使其民族獨立。此若比之門羅主義，則此點果正當乎？但從其正確方面考察之，則又有不然。誠以門羅主義「於美洲大陸……今後歐洲諸國不應再作為將來殖民對象之想」，此固可見其含有在美洲大陸從歐洲支配之勢力下以圖解放之意義。但於此所明言者，僅指「將來」之殖民之對象也。過去與既已確立之殖民固無問也。此則於上述之情形，美洲大陸「鑑於既已取得，維持其自由獨立之狀態」由此附帶之說明觀之，固甚明晰也而當時拉丁美洲諸國既已自其本國西班牙與葡萄牙宣告獨立，故應維持既已存在之「自由獨立之狀態」，是故此種狀態俱係現已存在者，僅不過為今後對美洲大陸不得視為殖民之對象而已，決非為現在殖民地解放，而使其獨立者也。更觀其決定的背書及

門羅氏之咨文後半所述：「對歐洲諸國現在之殖民地或屬地，美國迄今不爲干涉之，今後亦不復干涉之」，由此可知，對於現在之殖民地或屬地不加干涉，因而亦即非求其解放或使之獨立者也。要之，門羅主義對於現在歐洲之殖民地與屬地並不干涉之或求其解放使之獨立也，惟既以自力爲獨立宣言而克維持之者，若施之以壓迫，或以之爲新殖民地之對象者則必爲反對之也。由此觀之，則假藉亞洲門羅主義之名義，而圖於歐美勢力支配下亞洲之領土求其解放，使其民族以獨立，全無根據，殊屬不當之言也。此乃顯非門羅主義所包含之內容，已逾越於此範圍以外矣。∴」（見「中央公論」昭和八年八月號）。

由此可見，我們若假借美國人所發明的政治術語來命名一種新運動，不論其爲什麼『遠東門羅主義』，什麼『日本門羅主義』，什麼『亞洲門羅主義』等等，只要經過西洋人如羅天樂氏拉克斯里氏，日本人如橫田喜三郎博士的比較剖析，便都『全無是處！』這樣所以和那個爲我們中日兩國的先知先覺所發明的『大亞洲主義』乃自有其不可磨滅的優越之處！小寺謙吉氏曾說：『夫美國門羅主義，固嘗以正義人道誇於衆，其於東半球之領土政治，雖遠乎自立於不預之地，是其建國之始，擁有廣衍無窮之富，方治其內之不遑，不得已而出此耳，如有可以歐

洲之資本，與亞細亞之人力而拓之致富，亦將變債務國而爲債權國，廁乎世界之列強，門羅主義，逐漸染羶腥而不自知，自麥荊總統兼併菲獵賓島以來，久矣欲化而爲帝國主義，且其注目之標的，尤在乎中國，是無他，其資本之贏利也豐，且工業未興如中國，如以製作品爲之給，而仰其原料之供給，尤可以爲帝國主義者之寶窖也。……蓋太平洋者，日本之肺肝，亦美國之胃腑，兩國之政治家，久欲決其制海權而未由，而勝負之分，將親及乎中國政治經濟之勢之孰優，此理之自然而不容疑者。日本於中國，其能獨異乎列強者，以有人種，地理、歷史、文學、藝術等之誼存，反是而美之與競，僅持資本爲護符，……（見『漢譯大亞細亞主義論』序論第六至八頁）又說：『世人以大亞細亞主義爲全美主義之模倣者，復有論全美主義之爲自然的，而大亞細亞主義之爲不自然的者，是皆吾人所不取者也，何者？蓋大亞細亞主義者，並非爲全美主義之模倣，實出於理性及必要之類似耳，至兩者有自然的之差異，吾人見解，正與此論者，適相反對也。……華盛頓大學教授亞芎博士之『全美主義』，其論全美主義之障礙，列舉不自然而事實及十項之多：『……第一爲地理之懸隔；……第二爲人種之差異，即北美以盎格魯撒遜種英語國民爲主要分子，而南美則爲西班牙語之拉丁民族也。第三爲宗教之不同，即一爲新教，一爲舊教；第四爲經濟上之齟齬；……第五爲雙方

信用之缺乏，即對於過去之歷史，及現今美國之侵略的態度，南美入常懷慊然之念。第六爲社會的事情之不一致；第七北美美人欲於門羅主義標榜之下，統一南美，南美人不覺有門羅主義之必要，因其自信不爲歐洲所征服故也，強爲提倡全美主義，反令南美入疑北美美人有侵略的野心；第八爲感情之乖離，即排斥歐洲人，其結果反令驕慢之北美美人，較現在更拔扈，故南美人不喜全美主義；第九爲武力不足，……美國武力，不足抗歐洲列強；第十爲共通條件之不滿足，而南美入雖肯乞歐人之援助，却不屑受北美美人之援助。以日本與中國之關係比較之，因中國人之誤解，而有雙方信用缺乏之感情乖離等情，甚爲相似，即對華之投資額，日本遠不及歐洲列強，亦爲事實，然其他各點，則皆能令兩國聯結，有雙方共通的及互惠的一致，較諸全美主義之爲不自然的不同也。其中日之主義的統合，爲大亞細亞主義之中心楔子，不可不謂自然的矣。……」（參看前書第三章第一七五至一七七頁）誠然！中日兩國幾千年來就有『種族』上與『文化』上的深厚密切的關係，只因受近世帝國主義的刺激與影響纔『參商遙隔』，『爾詐我虞』，甚至『同室操戈』！日本前首相近衛文磨氏在本年七月七日的演說詞裏也曾大聲疾呼的要喚起中國國民間所潛在之『東洋的本能』，我們始終相信不渝的『大亞洲主義』亦即建築在這個『東洋的本能』上面，所以不惟和美國的『門羅主義』不

同，即與摹倣的『遠東門羅主義』亦不能相提並論，混爲一談。

述大亞洲主義

江鎮南

(引言)中國由專制進爲共和，由帝政進爲民主，此一豐功偉業，實爲總理畢生從事革命的最大收穫。但總理領導人民從事革命的目的，並非以此爲限，最要緊的，要在政體改革之後，能實行三民主義及五權憲法，把中國造成一個真正自由平等的國家。前者是形體的革命，後者是實質的革命；當然實質較形式更爲重要。惜乎一般革命黨人，往往昧於此旨。他們在形式上握得政權之後，以爲革命已經成功，沒有什麼再要革命了。他們把革命的主義丟開，連總理所諄諄的一切訓言也置諸腦後；和滿清官僚民國軍閥一樣，只在爭奪政權一點上做功夫。因此二三十年來，只有民國之名，而無民國之實。不僅如此，他們更勾結一切外來勢力，以保護其既得的權位，不惜把國家利益任聽他人宰割。由於這種演變，國家狀況便年年惡劣，終於演成今天空前的慘劇。

自民國元年至十五年這個期間，中國政權落於袁世凱、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張作霖、曹錕等官僚軍閥之手，國是凌敝，甚於滿清，同時革命黨人的意志與精神，亦屢興屢敗，因此總理領導同志，先後發動討袁，護法，改組黨務等革新運動，且於十三年下令，正式北伐。不幸大業未成，總理竟因宿疾不治，與吾人長辭！

總理無論對於政治或黨務，主張是一貫的，精神也是一貫的。凡是離開主義或背叛革命的，任何措施，他一律反對，絕不徇情遷就。他爲什麼要如此呢？因爲一遷就便不能致中國於自由平等。他一生一世未曾瞬息忘棄他革命的目的。總理是死了，他不再來領導我們了。然而，他在生前對於主義政策以及一切革命方法，固已詳詳盡盡的指示我們；我們任何人，如果他是革命的，是信仰總理的，他便該

遵守 總理所指示的一切教條，爲中國的自由平等而奮鬥。

可是 總理死後的革命情形是怎樣呢？

十三年北伐開始，到十七年北方歸順，形式上，北伐是成功了。到今年爲止，正好又是過了十五六年。這個期間，政權是一直執掌於蔣介石一人之手。蔣不是革命黨人嗎？不是自稱爲 總理信徒的嗎？不是更兼掌國民黨的獨裁權的嗎？而他的政績又是如何？他：投降帝國主義，先是討伐後來又投降共產黨，勾結帝國主義的國內代理人如金融資本家，軍閥及反動的舊政治集團，御用國民黨，培植個人勢力，壓迫民衆，一切罪行，實較前個十五六年間的北洋政治有過之無不及。現在，他更爲了個人的生命與權位，不惜把整個國家與全國人民供其犧牲，實行其亡國滅種的長期抗戰政策。他的所行所施，完全表現他是最反動的反革命者。

十三年以前，對於反革命的勢力有 總理領導革命勢力制裁它。十三年以後，因爲 總理不在人間，蔣介石反革命勢力便一直滋長，從不稍衰。但是，革命的責任並不是限於一人的，凡爲國民，尤其是矢志革命的 總理信徒，皆有這個責任。我們應該負起這個責任，爲了國家的自由平等，更爲了當前的國家大難，勇往直前，向現實的反動勢力進攻！

我們料定，當我們進攻的時候，反動勢力會拿他所御用的黨統及革命口號來誣蔑真理，會用種種手段來欺騙全國人民及全體革命黨員。現在，我們要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爲使全國人民及全體革命黨員不被其蠱惑麻醉，故把 總理遺教中的重要部分，針對現實，揭示出來，使全國人民及全體革命同志明白他們究竟是什麼從而認清爭取國家自由平等的光明大道。

現在先來研究中日兩國應否及可否合作這個問題，這個問題是解決目前中日

戰事的基本原則。此問題有了正面的答案，則中日爭端便有正當的解決途徑，否則，縱然能由他種辦法把爭端暫時消滅，將來仍然要發生的。

總理對於亞洲問題，始終主張中日兩國應該合作不應該分離。在總理的著作及言論中，關於此問題的論證很多，最具體的文獻有三：一爲「致犬養毅書」，係總理親自起稿。由孫夫人手抄寄去，原稿現存夫人處；此爲總理亞洲復興政策之大著，非尋常書翰可比。二爲「中國存亡問題」，此係朱執信先生筆述，以朱先生名義出版；當出版時，捕房搜查泰東書局，並欲捕朱先生，因爲文中主張中日聯合以對歐美。三爲「大亞洲主義」，係十三年繞道日本北上時，對神戶五團體的演講詞。「致犬養毅書」一文，筆者未曾親觀；「中國存亡問題」一書，早年見過，今祇憶及大意，不數其詳。現在可以明權恭引的，惟有「大亞洲主義」講詞一種而已。卽此講詞，亦足代表總理的主張之一斑了。

總理說：「我們亞洲，從前有哲學的文化，宗教的文化，倫理的文化，和工業的文化；這些文化，都是亙古以來在世界上很有名的。推到近代世界上最新的種種文化，都是由於我們這種老文化發生出來的」。這是總理在追想亞洲的過去光榮；過去既然有光榮時代，何以現在失去光榮呢？因此他萌發了恢復未來的光榮的意志。

「到近幾百年以來，我們亞洲各民族才漸漸萎靡，亞洲各國家才漸漸衰弱；歐洲各民族才漸漸發揚，歐洲各國家才漸漸強盛起來。到歐洲的各民族發揚和各國家強盛之後，他們的勢力便漸漸侵入東洋，把我們的亞洲各民族和各國家，不是一個一個的銷滅，便是一個一個的壓制起來。一直到三十年前，我們亞洲全部，可以說是沒有一個完全獨立的國家」。這一段，總理是告訴我們：亞洲各國家之不能完全獨立，是由於歐洲新興國家的壓迫；所以，我們欲求中國獨立自由平等，必須脫去這些國家的侵略勢力。

「否極泰來，物極必反。亞洲衰弱，走到了這個極端，便另外發生一個轉機；那個轉機，就是亞洲復興的起點！

「就是，日本當三十年以前，廢除了和外國所立的一些不平等條約。日本廢除不平等條約的那一天，就是我們全亞洲民族復興的一天」。總理把日本的明治維新，看做是亞洲的全亞洲復興的起點，這是他的眼光遠大處，也就是他的大亞洲主義的精神之所在。總理對於中日關係是以亞洲的全面來講的，並不像現時一般短視者，只顧到問題的片面。總理的大亞洲主義，是世界大同主義的一環，他的主義是依據天下為公的政治思想而產生的。對於任何國家，只要她自謀獨立而不侵犯她國的獨立，總理是一視同仁，不存嫉忌。可惜我國執政當局，不知善於

運用日本的復興，反而嫉恨她爲亞洲所致力成績；同時，日本國內也有不以亞洲前途爲念，反而跟着歐美而壓迫中國的思想；以致四十餘年來，亞洲復興的工作絲毫未曾建樹，卻是中日兩個生死相關之邦反而決裂起來了。然而，在這兩年來的慘痛經驗之下，日本卻有了相當覺悟，覺悟中日兩國有提攜之必要了；我們中國也就應該體會總理所說的「走到極端」和「發生轉機」的提示，及早回頭，本着平等的精神，與日本合作；則不僅中日爭端可了，同時可以開始走上國家獨立和亞洲復興的大道。

「從日本戰勝俄國之日起，亞洲全部民族，便想打破歐洲，便發生獨立的運動。所以埃及有獨立的運動，波斯，土耳其有獨立的運動，阿富汗，阿刺伯有獨立的運動，印度人也從此生出獨立的運動。所以日本戰勝俄國的結果，便生出亞洲民族獨立的大希望。這種希望，從發生之日起，一直到今日，不過二十年，埃及的獨立便成了事實，土耳其的完全獨立也成了事實，波斯，阿富汗和阿刺伯的獨立也成了事實，就是最近印度的獨立運動也在天天發達。這種獨立的事實，便是亞洲民族思想在最近進步的表示。這種進步的思想，發達到了極點，然後亞洲全部的民族才可以聯合起來，然後亞洲全部民族的獨立運動才可以成功」。這段是說明亞洲各民族在日本戰勝俄國之後，陸續發生獨立運動及其成功的史蹟。而

中國在這若干年中，除了對內的變亂而外，對外，非但沒有什麼獨立運動的成績，反是愈被列強束縛起來。我們對於波斯阿富汗這些弱小國家的努力自強，惟有自抱慚愧而已。猶憶十三年北伐時，對外曾高喊打倒帝國主義及廢除不平等條約等口號，蔣介石且於十六（十七？）年在南京中央黨部當着數千請願民衆說過這句斬釘斷鐵的話：「三年之內，如不把不平等條約取消，你們來斫我蔣中正的頭」！這是筆者親耳所聞的。三年三年，不知若干年了，帝國主義並未打倒，不平等條約亦未取消，却是蔣介石掉過頭來投到赤白帝國主義者的懷裏去了。現在，中日兩國的關係雖是裝上一層可慘可怕的外形，但彼此若能及早回頭，拋棄宿嫌，言歸於好，則「亞洲全部民族的獨立運動」，也許即以此爲出發點而能獲得成功。

「近來在亞洲西部的各民族，彼此都有很親密的交際，很誠懇的感情，他們都可以聯合起來。在亞洲東部最大的民族，是中國與日本。中國同日本，就是這種運動的原動力。這種原動力發生了結果之後，我們中國人此刻不知道，你們日本人此刻也是不知道；所以中國同日本，現在還沒有大聯絡。將來潮流所趨，我們在亞洲東方的各民族，也是一定要聯絡的。東西兩方民族之所以發這種潮流和要實現此種事實的緣故，就是要恢復我們亞洲從前的地位」在這一段中，總理不

僅指出中日兩國合作的必要性，并又指出其必然性。總理所說的「潮流所趨」，是不是應在今日？我們固不敢武斷；但就目前勾心鬥角綜錯複雜的世界形勢而言，中日兩國此時合作起來，以隔絕那種紊擾的野火，至少是與中日兩國有利無弊的。若是不然，中國以日本爲敵，則爲友者必是亞洲以外的英法蘇聯或美國；中國既與此等國家有了深切關係，則大戰爆發，亦必隨之捲入旋渦；試問中國有無此種必要呢？本來，國際形勢的演變，在大政治家的目光中是可以相當預測的，以總理的獨特天才與其政治上的素養，當時預斷中日兩國在十餘年後之今日，將順應潮流而行聯合，并非揣想之詞。總理在當時也明知中日兩國人民皆不曉此理，故只預爲警告，教兩國人民注意。時至今日，我們縱不必以總理的預示爲必信之徵，但既有此空前的進退之機會，我們卽此機會以攷慮總理所說的潮流，不也是需要的嗎？

我們爲什麼要攷慮這種潮流呢？總理說：「這種潮流，在歐美人是看得很清楚的；所以美國便有一位學者，曾做一本書，專討論有色人種的興起。這本書的內容是說日本打敗俄國，就是黃人打敗白人。將來若這種潮流擴張之後，有色人種都可以聯絡起來和白人爲難，這便是白人的禍害，白人要思患預防。他後來更著一本書，指斥一切民族解放事業的運動，都是反叛文化的運動」。讀了這段訓

言，當知彼白人國家昌言幫助中國抵抗日本的目的安在。明白了這一點，便知「亞洲全部民族的獨立運動」的潮流，現在是已屆其時。

總理所提倡的大亞洲主義，是爲全部亞洲；不僅是爲中國，同時也爲日本。主義的精神是平等的，自由的，公正的，自動的；不是屈求勉強的。所以他在演講的結語中，特別對日本提出警告說：「我們講大亞洲主義；以王道爲基礎，是爲打不平。美國學者對於一切民族解放的運動，視爲文化的反叛；所以我們所提出來打不平的文化，是反叛霸道的文化，是求一切民族和平等解放的文化。你們日本民族既得了歐美霸道的文化，又有亞洲王道文化的本質，從今以後，對於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鷹犬，還是做東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們日本國民去詳審慎擇！」總理爲何要拿王道來警告日本呢？就是深恐日本誤解大亞洲主義的實質，恐怕日本利用大亞洲主義的幌子，和歐洲霸道國家一樣的來侵略中國。思效之嚴密，態度之光明，可謂無所不至。

現在，正是日本方面高唱以「東亞新秩序」爲解決中日問題之基本立場的時候，中國人民也有懷疑日本是別有用心，而這種懷疑總理是早已想到，並且提出了切實有效的試金石的方法。總理在同時期對日本人士說道：「日本維新，是中國革命的第一步；中國革命，是日本維新的第二步。中國革命同日本維新，實

在是一個意義。可惜日本人維新之後，得到了強盛，反忘却了中國革命之失敗，所以中日感情日趨疏遠」（對長崎新聞記者之談話），這是先指出日本的錯誤。所以他又說：「若是日本真有誠意來和中國親善，便先要幫助中國廢除不平等的條約，爭回主人的地位，讓中國人得到自由身分，中國才可以同日本親善」（對神戶各團體歡迎會演詞），這就是總理的試金石的办法，如果日本能自行取消不平等條約，則中國對日本便得了自由；若日本更幫助中國取消各國的不平等條約，則中國便得了完全的自由。有了自由權，還怕什麼假意與後患呢？此次中日問題之解決，也當以此爲條件，可不是「近衛聲明」已經承認可以取消不平等條約及收回租界了嗎？我們只要把握他的諾言，中國決不至失足；否則，總理固不必如此主張了。

但在十餘年前的當時，日本方面是否願意如此，總理並不知道，所以他用反問的語氣先行試探道：「我們中國國民，想同日本國民聯絡一氣，用兩國國民的力量，共同維持東亞大局。要達到聯絡兩國國民的目的，方法很多。不過現在已經有了這個目的，究竟是什麼方面好呢？請大家研究！請大家指教」（對神戶新聞記者之談話）！隨時，便有一位東京朝日新聞社中國部長答道：「要達到維持東亞大局的目的，必須中日兩國國民，聯絡一致，同心協力，合成一個力去做，

才可以成功；要是分開成兩個力去做，一個是失敗，無論那一個都是失敗。我認定這是一個要點。至於要聯絡兩國國民的方法，必須互相提攜。不過兩國國民，各有各的希望，各有各的責備。並且希望太過，所以責備也大苛；弄到結果，各有各的困難，以致彼此都想聯絡；都不能實行。研究到這個地步，中日兩國人民，非互相了解不可；互相了解，也就是聯絡之一法」。這位記者的意見，雖係出之個人，却也可以代表當時一般有識的日本人的重要眼光。把這段談話拿到現在來重提，意味更覺深長。誠然，自從近衛發表二二聲明和汪副總裁發表艷電以來，中日兩國人民對於和平合作的意念，本已如饑如渴，恨不能立刻實現；然其所以遲遲不能實現者，主要原因還是於兩國人民的心理中尚存有不少未盡消除的疑懼。此種疑懼心理一日不破，中日和平即一日不能澈底實現，那末怎樣就可以打破這種心理呢？惟一的辦法就是要日本尊重諾言，履行平等的交涉，一面停止攻擊，討論善後，一面承認廢除不平等條約及收回租界，使中國恢復主權。果能如此，則其他和平條件自必迎刃而解了。所以總理在該次談話中又說：

「如果幫助中國廢除了不平等的條約，當然可以得中國的人心。日本完全得到了中國人的心，以後的大權利便無可限量。譬如中國廢除了條約，要行保護稅法，自由增加關稅，日本自然要受損失；但是日本幫助中國，中國國民真是感激

日本，中日兩國便可以合作互助，另外再立互助的條約，像經濟同盟和攻守同盟那些互助的條約，都可以再定」。照總理此一段的訓言，非但預示今日中日問題之解決當以合作爲前提，而且又可以說，他已預斷此次日本所提的和平條件（近衛聲明）合乎情理與需要，中國可以授受。日方的條件有三：即親善友好，經濟提攜，及共同防共。再就總理的主張來看：第一中日兩國聯絡，不是親善友好嗎？第二，訂立經濟同盟，不是經濟提攜嗎？第三，訂立軍事同盟，不是較共同防共更進一步嗎？只要日本肯放棄不平等條約，總理即可答應上述三原則，爲什麼現在日本肯這樣做而蔣介石却不答應呢？爲什麼日本的東亞新秩序并不悖總理的「大亞洲主義」而蔣介石硬要說它是侵吞中國的陰謀呢？爲什麼汪副總裁遵行總理的遺志而蔣介石反污蔑他是漢奸呢？如果總理尚在，我知總理必痛斥陰謀者不是日本而是蔣介石！汪先生不是漢奸而蔣介石正是漢奸的梟雄！

二八、八、一三、於上海

實現『大亞洲主義』的方法的意見

吳畏

按關於實現「大亞洲主義」的方法與步驟，日本的小寺謙吉氏就曾說過：

『在亞細亞之面積，黃色人種以外，有其他有色人種生息其間焉，有既失獨立之數國概已爲白色人種所征服，故欲以所謂大亞細亞主義者，使亞細亞全幅員千七百五萬七千餘方英里，九億之民衆（原註——此數字據一九一四年發行「世界年鑑」所載），爲政治的結合，則未免失之輕躁，何以故？蓋如自挑撥非和平的機運而擾亂他國領土，不僅爲國際上之重大謀叛，且爲義俠而過於冒險，……吾人今後須記述之得保長命之大亞細亞主義，其歷史得分四期：即第一期黃色人種即蒙古民族中最強國之日本及最大國之中國，當統一於此主義之下；第二期，同族中獨立之國民，同包容之；第三期，異人種征服之同民族，當統合於此主義之下；至第四期，漸普及於全亞細亞之各民族；而當今之急務，則爲第一期事業，至第二期事業，須俟機運成熟而後可，是所謂大亞細亞主義者，非攻勢的而爲防禦的，亦當然之理論也。……』（參看「漢譯大亞細亞主義論」第一七〇至一七一頁）

他又對於開始實現「大亞洲主義」的第一期的辦法規定如下：

『……今中國猶爲農業國如故，以米麥爲物產之大宗，凶歉之歲，雖屢以防穀之令，致爲吾與彼之外交問題，彼既擁有豐饒之土地，而猶至於若是者，其農業之未進步，實使之然，吾國（指日本）若指導於其上，且闢其未闢之富源，則取而補吾之所缺，當綽乎有餘裕焉，中國南方之棉花，其品質因不及乎印美，北方之羊毛亦不及乎澳亞，然以供己國之用，則有事之日，不獨可無不足之患，且即吾國（指日本）棉花工業品而論，在輸往中國安南暹羅印度南洋羣島以及滿鮮諸地者，與其以優異之原料，毋寧以此生產物之爲愈，今中國棉花之至吾國（指日本）者，歲不可勝計，此可徵諸統計而自明誠即棉花羊毛而改良之，則進步之望，未嘗盡無。至於鐵則中國直能爲世界第一寶庫而無愧，日本雖爲洋上之一島帝國，能與此豐富鐵國相接壤，實天假之幸福焉。火油在中國亦頗夥，雖有已爲美國所佔者，若更進而調查之，則有望之油井，猶不知凡幾，此各國專門家之所其認者也。……』（參看「漢譯大亞細亞主義論」第四十七至四十九頁）

這些話和兩年以前盛行一時的「中日經濟提攜」的論調差不多完全一致。記得那時日本方面雖指天畫日，信誓旦旦的說：『日本絕對沒有存着「夷中國爲殖民地」的念頭』，但中國方面却小心翼翼，疑神疑鬼的提防日本名爲提攜，實等

豪奪，所以結果雙方都是空勞往返！小寺謙吉氏雖在早年即替日本辯護說：

「……日本既合併朝鮮，定滿州爲勢力範圍，其結果則日本立於當保持大陸政策之位置也，然而此事實，足以使中國人，猜忌我日本之一大原因也，即列強各國，亦誤解我日本有侵吞中國領土之野心，故猜忌之言頻出不窮，此誤解之甚者也。日本在大陸以建設立足地者也，非爲侵略中國領土也，乃爲本國自衛安固，使易於保全中國，而謀東亞永久和平之計也。自沿革上而言之，中日之役肇端於朝鮮問題，其結果中國大敗，於是虛弱老大之國，以招今日之運命，此原於中國藐視天津條約，欲自合併朝鮮，而爲不法背信之結果，其責固在中國也。……」

其次，日本多堅忍冒險，舍巨大之犧牲，與俄國在滿洲一爭雌雄，有如陷入虎口，東亞之和平既危急，而日本自衛上亦多被壓迫，中國既無實力以防之，故日本起而代之，與俄國南下之勢力相對抗之；戰役之結果，承受俄國之權利，置南滿洲於日本勢力圈內，其所以然者，則（一）因中國之實力，即在將來，亦不能防遏他國勢力侵入滿洲；（二）日本即有担負維持東亞和平之責任，對於他國之均勢上，不得不在大陸中，以建設其立腳根據地位；（三）爲保護戰勝所得之鐵道港灣等之經營，及其他諸利權也。即日本併朝鮮，亦因朝鮮無自立能力，且

其反覆無常，對外思想之幼稚，爲東亞和平危險之原因，故爲根本之解決，以永除爭端者，不得不合併朝鮮也，故今日日本在滿鮮之政治地位，非所以表現其目的，乃因他種目的而生之結果也。更自國防上而言之，日本與中國之爭朝鮮問題也，亦如英國之於比利時，有關於本國安危存亡者也，故深憤德國破壞其中立，乃加入此次大戰爭也。徵之於歷史，在三百二十餘年前，豐太閣征朝鮮，大敗，對島海權乃歸於中國海軍，此最大之原因也。至日俄戰役，日既勝俄，對島海權乃確實歸日本掌握也。夫此重大關係，亦不待言也。日本對於對島海之位置，亦如英國對於特巴海峽之位置也，其權力之消長，卽國家之死活問題也。日本與中國之於朝鮮問題而戰也，中國對於半島之壓迫，在日本國防自衛上，實出於不得已也。又滿洲既一入於他國版圖，則亞洲所存之二大獨立國，其連絡亦爲之中斷，所謂黃色人種之雙生兒，不能唇齒相依也，勢必共歸於滅亡而已；設中國果有實力以支持之則可，彼日俄戰時，有滿洲主權者之中國，非嚴守中立而不動者耶？故代中國起而謀之，以日本之勢力而守此滿洲者，亦理所當然也，彼依馬關條約而割台灣者，亦當然之理也，當時法國既佔據安南，英國領有香港，俄國更在渤海以求立足之地，德國亦在中國沿海各地，而物色適宜之地，夫形勢如斯，設台灣復爲他國所佔有，則黃海渤海日本海，亦殆爲其勢所壓迫之也，彼太平洋之

制海權，必爲此等強國所掌握之也，故日本佔有台灣，可除此危險，永保太平洋之均勢，維持東亞全體和平也，不敢謂之曰，乘中國之衰微，以侵奪其領土也。若準此理以佔有台灣外則日本之對於中國也，毫無尺寸領土之侵奪，此後中華國民，若能了解日本之責任，以獨力而支撐此大局，則將來尊重我日本特殊之位置，可相親而共愛之也，同文同種之兩國民，以共求其生存，亦勢有必至，理有固然者也，且日本對中國無野心之存在也可觀於拳匪事變及他種事實而明之也。當盛倡瓜分中國論時，美國提議之門戶開放說，我日本贊成之，且與英國相提攜之，以挽中國狂瀾於未倒，觀此等事實，則日本無領土之野心也明矣。特美國與東亞天地，素少政治的關係，而忽唱此開放門戶說，而英國既於通商上佔有優上地位，各種權利亦先佔有之，且以金鐵政策在中國各地盛爲活動，首先贊成門戶開放說，蓋亦爲本國利益計，出於當然者也，獨與日本之主張保全中國之理由，則大相反也，卽中國之滅亡，乃黃種人全體休戚所關也，中國之瓜分乃使極東紛擾之也，與日本之隆替，大有關係焉，且與亞洲文明之消長，尤有大關係也，蓋本於數千年間之歷史感情友愛等之發作者，正復不少也。

今以保全中國而向中國誓約之者，今尙無一國也，僅日本一國，以其實力與對外協約等，可以確保之也。卽一九〇二年所結之日英同盟之條約：（一）維持

極東之現狀及全局之和平，（二）保全中國之獨立及其之領土，（三）在中國之列強之商工業，以維持機會均等主義爲目的，其後改訂二次，亦終不渝乎此根本主義也。一九〇七年結日法協約：（一）鞏固兩國之友誼，去誤解之原因，爲却保極東之和平，須尊重相互獨立及領土之保全，（二）確認在中國之機會均等，此後又有日俄協約：（一）承認中國獨立，領土保全，并機會均等主義；（二）現狀之存續，擁護支持之。其翌年又有日美協約：（一）日美兩國互相尊重其領土；（二）依其權內所有之和平手段，以保全中國之獨立及領土；（三）支持在中國之列國機會均等主義。惟日德之間，尙未有協約，然一九〇〇年英德間之協約，亦有保全中國領土之條約，此在事實上，可保障中國領土之保全也，除英德協約外，大抵以日本爲中心，相約保全中國之領土也。……要之，中國之獨立，卽謂之依日本之保障，以保全其主權者，殆亦無不可也。……」（參看漢譯大亞細亞主義論，第一四七至一五三頁）

氏所列舉的許多事實，在日本人的立場固然彷彿是「仰無愧於天，俯無祚於人」，卽在我們中國人裏面，也有深知滿清朝廷的腐敗無能，致屢次陷中國於被人瓜分的絕境，而拯救我們於間不容髮的危急存亡的緊要關頭，則大多數都歸功於美國的門戶開放主義，（這裏與美國人善於在華作文化宣傳及親善工作恐有絕

大關係）其中亦有少數具有特識者如孫中山先生即乾脆明白的承認日本對於中國並非澈頭澈尾懷抱着惡意與野心，（下面當再為詳述）故前逝世不久的「日本通」某先生即很沈痛的說：「九一八事變以前中國對付日本的政策，都通通是錯誤的，九一八事變發生以後則情形便有些完全兩樣！」他的見解尚且如此，其餘最多數的人更是「談中日親善則色變！」像這樣親善的基礎都還一點沒有，怎麼談得上什麼「大亞洲主義？」何況如小寺謙吉氏計擬的第一期的辦法，在我們中國人看來，中國雖「猶為農業國如故」，但因農民每人所耕地面不惟面積過小，而且田場耕地的分佈也過於散碎，加以過半數的農民所耕地地的一部份或全部份都須向地主租賃，租額既稱奇重，租期又屬苛刻無定，所以中國農業的本身，實在有不少先天難治的隱疾存在，今後惟有增進工業的生產，以調劑農產的貧乏與不足，然因工業可在國家計劃經濟制度之下發展並隨處都有求於工業先進國的資本技術的合作的緣故，結果當不致因競爭而起衝突，從這一點上看來，小寺謙吉氏的實現「大亞洲主義」的入手方法就不免有些「陳舊落後」，須得改絃更張。

上面既經說過我們若以枝枝節節的方法來實現「大亞洲主義」，將令人有「俟河之清，人壽幾何」的感慨，我們現在試掉過頭來看看「大亞洲主義」的先覺者孫中山先生對於日本的期待與其所擬的辦法究竟怎麼樣？前已引過小寺謙吉氏

替他的祖國，日本的「對華政策」慷慨淋漓的辯護的一篇洋洋大文了，孫中山先生生在民國六年反對中國對德參戰，曾命朱執信氏筆述所見成爲「中國存亡問題」一本小冊子，裏面也有一段說：

『……中國之舊官僚，有其習性，只有與營私利之人，或被其認爲好意，此外無論何事，彼必以不肖之心度人，日本之不願中國加入歐戰，固曰大隈內閣不欲助成袁皇帝，然決不得謂爲主要之原因，主要之原因，乃在中國加入自身之不利，從公平之觀察，以批評日本當時之態度，可謂第一爲中國謀其利害，而後計日本之利害，（原註！此時中日利害相同，自不待言）以此友情，救中國之危，而措諸安定，中國之論者，不知感謝，反以是爲失我外交獨立，欲推刃而復仇，誠不能謂此輩官僚之思想，爲尙有理性存在者也。日本誠見中國加入絕不能爲協商國擢敗德國之助，而一旦加入，無論孰勝孰敗，中國必不免爲犧牲，以中國爲犧牲，中國之不利，亦日本之不利也，爲避此不利而不惜得罪於同盟國，亦可以謂之無負於中國矣，而論者則謂之挾制中國，謂之不使中國有外交，此所以動失東亞聯合發展之機會，而爲白人所利用，抑亦以彼輩洪憲遺臣，對於袁氏加入稱帝，實有無窮之屬望，故一旦失之，慚忿交并，轉而致其深怨於日本也。論者動謂日本要求廿一條款，卽爲獨佔中國利益之徵，侵略之實行，然當知廿一條款初非

日本之意，而日後袁氏稱帝事急之際，曾以有過於第五項之權利供於日本，而日本不受也。始袁氏既解散國會，改約法，第二借款將成矣，而敗於歐戰之突發，乃改其昔者排日之態度爲親日，因求日之承認帝制，而諾以利權爲報酬，所謂廿一條款要求者，袁自使日本提出其所欲，以易其地位，非日本自以逼袁也。

袁之排日，自昔已著，日人惟知事定以後必爲反噬，故重索其權，以求免未來之患，顧此條件無端而洩漏，無端而有國民之反對，各國之責言，袁尙欲貫徹其主張，乃暗請日人派兵來華，致最後通牒，以鎮壓國中反對者，而便於承認日本所主張，然終不敢諾第五項，如是者又半年。帝制起而雲南倡義，袁忽使周自齊爲東渡特使，不顧國中反對，諾允日之第五項，且益以他種利權，爾時日本欲助袁平定民黨，博取利權，易於反掌，然而舉國反對，不爲利動，袁策遂不得行，以此二者比較而觀，可以知日本於中國不必以侵略爲目的，其行動常爲中國計利而非以爲害，論者不察於是，徒以日本爲有野心，非篤論也。日本之不贊成中國加入，與不受周自齊所賚之賄，同爲純粹之正義所驅，吾人於大隈之舉動，固不盡贊同，而公論要不容沒。卽在此次日本雖翻然勸我加入，而吾尙深信彼中不無審察利害，不樂促我不墮此漩渦者，故於所謂加入條件者，日本不遽卽贊同，卽其心中以爲日本對於英國，既有同盟關係，勢不能永拒英國之求，而亦不欲負

誘我以入協商之責任，故但勸以言而不肯供其賄（原註——關稅改正賠款延期以爲加入條件，則皆賄也）彼豈不知利益均霑之約尙存，將來不難追補，今茲所失，朝四暮三，本於名實無損，而必堅持之者，其心誠亦不欲中國以此而自決墮入危途，將以自慰其良心而已，況乎以終局利害論，中國之不保，同時卽爲日本之衰亡也，日本之勸我，非本意也。（原註——以上所引外交祕密皆有最確之來源，徒以責任所在，不能明指，要之此中事實，當局自知其不虛，而吾之操筆亦絕不以私意稍有所損益以就吾論據，此則可以吾之良心與名譽誓之者也）……」（參看『孫中山全集續集』第二集『中國存亡問題』第三十七至三十九頁）

孫先生這樣竭力爲日本剖白，其所希望於日本努力倡導並實現『大亞洲主義』者至爲懇切，如說：

『我們現在處於這個新世界，要造成我們的大亞洲主義應該用甚麼做基礎呢？就應該用我們固有的文化做基礎，要講道德，說仁義，仁義道德就是我們大亞主義好的基礎，我們有了這種好礎基，另外還要學歐洲的科學，振興工業，改良武器，來學歐洲，並不是學歐洲來銷滅別的國家，壓迫別的民族的，我們是學來自衛的。近來亞洲國家學歐洲武功文化，以日本算最完全，日本的海軍製造，海軍駕駛，不必靠歐洲人；日本人的陸軍製造，陸軍運用，也可以自己作主，所以

日本是亞洲東方一個完全的獨立國家，我們亞洲還有個國家，當歐戰的時候，會加入同盟國的一方面，一敗塗地，已經被瓜分了，在歐戰之後，又把歐洲人趕走了，現在也成了一個完全獨立國家，這個國家就是土耳其。現在亞洲只有兩個個頂大的獨立國家，東邊是日本，西邊是土耳其，日本和土耳其就是亞洲東西兩個大屏障。現在波斯阿富汗阿拉伯也起來學歐洲，也經營了很好的武備，歐洲人也是不敢輕視那些民族的。至於尼泊爾的民族，英國人尚且不敢輕視，她自然也有很好的武備。中國現在有很多的武備，統一之後，便極有勢力。我們要講大亞洲主義，恢復亞洲民族的地位，只用仁義道德做基礎，聯合各部的民族，亞洲全部民族便很有勢力。不過對於歐洲人，只用仁義去感化他們，要請在亞洲的歐洲人都和平的，退回我們的權利，那就像「與虎謀皮」一定是做不到的。我們要完全收回我們的權利，便要訴諸武力，再說到武力，日本老早有了很完備的武力，土耳其最近也有了很完備的武力，其他波斯阿富汗阿拉伯廓爾喀各民族都是向來善戰的，我們中國人數有四萬萬，向來雖然愛和平，但是爲生死的關頭，也當然是要奮鬥的，當然有很大的武力。如果亞洲民族完全聯合起來，用這樣固有的武力，去和歐洲人講武，一定是勝無敗的。更就歐洲和亞洲的人數來比較，中國有四萬萬人，印度有三萬萬五千萬，緬甸安南木蘭由共起來有幾千萬，日本一國有

幾千萬，其他各弱小民族有幾千萬，我們亞洲人數占全世界的人數要過四分之一，歐洲人數不過四萬萬，我們亞洲全部的人數有九萬萬，用四萬萬人的少數來壓迫九萬萬人的多數，這是和正義人道大不相容的。反乎正義人道的行爲，終久是要失敗的，而且在他們四萬萬人之中，近來也有被我們感化了了的，所以現在世界文化的潮流，就是在英國美國，也有少數人提倡仁義道德，至於在其他各野蠻之邦，也是有這種提倡，由此可見西方之功利強權的文化，便要服從東方之仁義道德的文化，這便是霸道要服從王道，這便是世界的文化，日趨於光明。」（參看「孫中山全集」第四輯第二三四至二三六頁）。

孫先生所見者實極遠大，而所發揮者亦非空泛，試看那位從不放言高論，最注重實際的小寺謙吉氏也以「大亞洲主義」之目的，「在於防禦的，平和的，固不待論，但歐美勢力危及自己民族生存之時，以共同之力禦之，使恢復亞細亞之元氣，統一歐亞文明，建設偉大新文明，貢獻於世界最後之大調和，即所謂大亞細亞主義者，其目的欲以亞細亞勢力，對抗歐羅巴勢力，必先使黃色人種中之獨立民族，互相提攜，各自確實其生存力，由是而新新文明得以實現，裨益於人類史上不謬，蓋斯主義於永遠防遏同一人種間之爭鬥，及由人種與人種之均勢而超於異人種間之戰爭兩點，實不失爲和平之一大福音也。」（參看漢譯「大亞洲主

義論」第一百六十二頁）他所說的這些話，實在可與孫先生前後呼應，相得彌彰。凡我中日兩國有志促進「大亞洲主義」的實現的同志，此後都應該坦坦白白，不再像從前那樣的「爾詐我虞」的互相妨礙摧殘，使孫先生及小寺謙吉諸先覺的偉大理想徒託諸空言而永不能表現於事實，所以我不管是否嘮叨瑣碎，也還要大聲疾呼的請求大家起來，再就孫先生等所提倡實現「大亞洲主義」的方法，加以精密的研究及多方面的討論，希望在最近的將來即可「坐能言而起能行」。

大亞細亞主義之真義

胡漢民

今日于廣州，獲見松井先生，私衷甚快，憶自民十六年在南京晤談之後，瞬將十年，當年之談話，至今尙使余留有深刻之印象，松井先生曾言，『中日兩國，必須本孫中山先生之遺教，體行大亞細亞主義，以維繫遠東之和平，謀中日之共存共榮，偷中日兩國不能協力于此，至使中國不得已與蘇俄及其他國家相攜手，實將爲日本之過，尤爲余松井個人之過』云：『余對松井先生此種光明勇敢負責之言論，至今引爲幸慰』。

今中日兩國之關係如何，無待深言，余認爲凡倡導大亞細亞主義者，於今日之情形，均應痛自刻責。不僅松井先生應引爲個人之過已也，民國廿一年，犬養木堂先生組閣時，余已在港養疴，曾致函痛論遠東事件，就主義黨誼歷史事實各點，督責木堂先生至爲嚴切，當時木堂先生曾以長函覆余，詳析中日事件之源起與癥結，謂『鮮有能明孫總理之亞細亞主義者爲其主因』，其言亦甚沉痛，木堂先生并誓以最大努力，解除中日間當時所有之危難，所以督過余者，亦至殷厚，自謂在政友會僅有數年之歷史，余在國民黨則有數十年之歷史，且爲寢饋於中山

先生遺教最深之人，中日關係至此，余亦不能自逃其責云，木堂先生爲深明中山先生大亞細亞主義之一人，尤爲最能贊助中國革命之人，不幸被擊殞命，賚志以終，實我人所深惜，余以爲在日本政治上，少一眼光遠大之明智的政治家，如犬養木堂其人者，不僅爲日本之不幸，實爲遠東之不幸也。

孫中山先生之大亞細亞主義，含義至爲明顯，約言之，爲東方的王道主義的，非西方的霸道主義的，爲濟弱扶傾主義的，非巧取豪奪主義的，爲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的，非帝國主義的獨佔主義的，故與近時日人所艷稱之所謂亞洲門羅主義，亦大異其趣，松井先生或能憶及一歷史的事實，民國二年時，余侍孫先生赴東京，曾訪首相桂太郎，孫先生語桂太郎云：『就大亞細亞主義之精神言，實以真正平等友善爲原則，日俄戰前，中國同情於日本，日俄戰後，中國反而不表同情，其原因，在日本乘戰勝之勢，舉朝鮮而有之，朝鮮果何補於日本，然由日本之佔有朝鮮，影響於今後之一切者，不可以估量，此種措施，爲明智者所必不肯爲』，桂太郎聞言，悚然語孫先生云『余此次受命組閣，僅三閱月，使余能主政一年，必力反所爲，有以報命』，此一經過，爲松井先生新親歷，想當能憶之。

又有一事，容爲松井先生所不及知者，余曾詳紀於論著中，民國四年，日本政府提出二十一條件，脅迫袁世凱承認時，余與孫先生等正亡命日本，反對甚烈

，我友人頭山滿家，與寺尾博士比屋而居，某日，寺尾博士招集若干學者，請孫先生演講：並詢孫先生云：『我人有一甚懷疑之問題，即日本因凌侮中國，侵佔中國之權利，然歐美各國，亦未嘗不凌侮中國，侵佔中國權利，何以中國人恨惡日本，較恨惡歐美爲尤甚，先生能解釋其故否』，孫先生云：『中日兩國，同文同種，誼如手足，中國如兄，日本如弟，在種種方面，本當提攜協作，至中國之於歐美，僅泛泛之友人而已，泛泛之友人，予我以凌辱，已爲難堪，乃爲之弟者，既不能同舟共濟，且進而凌侮乃兄，其凌侮之手段，尤較泛泛之友人爲甚，爲之兄者，將恨惡友人多乎，抑恨惡乃弟多乎？真理甚明，無待詮釋』，依此事實，亦知孫先生之大亞細亞主義，實以平等互助爲原則，注意於民族之濟弱扶傾，各個發展，以共同抵抗外來之侵奪主旨者，其非獨佔的，與巧取豪奪的，彰彰明甚，今日之日本，在政治上，固非桂太郎其人，卽爲犬養木堂者，亦未可亟得，至名人學者如寺尾博士者，亦不恆見，惟遷就事實，曲解亞細亞主義者，則所在多有，我人在歷史之回憶中，每引爲痛惜。

依余觀察，日本近年來對於中國之舉措，實甚失策，大致近年日本軍政之負責者，似勇士多而謀臣少，故果於實行，短於計慮，祇求一時之快意，未爲久遠之籌策，循此以往，遠東必成糜爛之局，而不可收拾，所謂亞細亞主義。適得其

反而已

余所欲鄭重申言者，余爲一亞細亞主義者，余之主張政策，中國人人，幾已盡知之，余以爲余之主張，正所以體行大亞細亞主義，以繼承孫先生之遺志，苟日本不能改變其對於中國之手段，則中國民族之情緒，縱爲政府壓抑，亦必愈益滋長，而出於最後之抗戰，孫中山先生爲大亞細亞主義之首創者，然反對二十一條件最力，余忠實體行大亞細亞主義，然必反對日本之侵略政策最力，余之此種主張態度，無絲毫矛盾之處，且必不以時間之轉移而有所變易，松井先生同爲受教於孫中山先生之一人，又爲近今倡導大亞細亞主義最力之一人，余甚願其能矯正過去之錯誤，併啓發日本國民之心理，以進於正義軌道也。

(一九三六年二月)

編後

大亞洲主義，倡導於本黨總理孫先生。嗣後中日雙方有識之士，亦時有論及。如日本小寺謙吉之『大亞洲主義論』松井石根之『大亞洲主義之必然性』等書，對於大亞洲主義，均有極詳盡的闡發，中國方面則因致力於獨立自主的國家建設，對於亞洲的獨立運動，反不亟亟，故對於總理所倡導之大亞洲主義，迄今未有專書討論。茲經三年來的中日戰爭，雙方才覺悟到中日兩大民族的自相殘殺，乃使亞洲以外的列強坐享其利，由於這種痛苦的經驗，重新認識大亞洲主義的偉大，日本固願意實行大亞洲主義，而提出「東亞新秩序」「東亞協同體」等口號，即中國欲建設一獨立自主的現代國家，亦非實行大亞洲主義不可。因是，大亞洲主義遂成爲時代的要求。現中日合作已由理論進入實行的階段，對於合作的基礎理論必須純化，加強作普遍的宣傳，使東亞全體人民都具堅固不拔的信念，以促實際工作的進行。這本集子的編印，其目的即在於此。集內所收文字，都經過鄭重的選擇。其中總理孫先生的「大亞洲主義」，當然是最高的指導原則；一切演繹都以此爲出發。其次，汪先生的「中國與東亞」，是促使大亞洲主義由理論

進於實踐的最重要關鍵。他如周化人先生的「大亞洲主義的哲學基礎」，從東方傳統的倫理道德上闡發，於以見大亞洲主義與東方民族性的融合無間。立論極爲精當。子遺先生的「大亞洲主義之史的發展」，搜羅掌故，既詳且備。導源演進的軌迹，一覽瞭然。允稱精心結構之作。而胡蘭成先生的「對於大亞洲主義的認識」，則就現在東方以至於世界的客觀現勢，說明大亞洲主義最適應眼前的現實。亦甚正確。其他諸篇，亦各有獨到，不可多得。最後，久已逝去的胡漢民先生的「大亞細亞主義之真義」，發表於民國二十五年，在那時他已經料到中日雙方仇怨不釋，必致弄成今日的「糜爛」之局，並且預料只有繼承總理的遺志，實現大亞洲主義，才有挽救。這也是一篇有價值的文獻。至於內容要點，這裏不過略舉一二，當然不能一一指出，希望讀者細讀一過，那就不難得到一個鮮明的概念。如果這本集子的刊行，能夠引起海內外的學者及同志，對於這個關係全亞洲以至於全世界前途極重大的主義，悉心探討，發揚光大，那就不特本黨之幸，亦即亞洲之幸，世界之幸了。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三月十二日初版

大亞洲主義論集

實價每冊國幣五角

編輯者

中央宣傳部

發行者

中央宣傳部

經售處

上海中華日報館
香港中華日報館
廣州中山日報社
各地大出報社

印刷者

同文印刷局

